

國民政府參謀本部的國防作戰 計畫與初期實踐(1929-1937)

蘇聖雄*

面對中日全面戰爭，國軍如何備戰？蔣中正的戰略規劃為何？相關研究已有長期的積累。本文延續此重要課題，另闢蹊徑，將最高參謀機關的作為引入視野。自十九世紀以來，最高參謀機關已成為列強高層軍事組織的核心，高層參謀提供情報、準備計畫細節、轉達作戰命令、監督統帥意志之執行。中國清末軍事改革，軍制仿西方、日本重新建立，亦設有相似組織。民國建立以後，此組織定名為參謀本部。由於民國初年制度不上軌道，參謀本部並未發揮作用；然而國民革命軍北伐以後，參謀本部重新組成，改頭換面，開始有所作為。蔣中正本人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務為人所悉，其實他也兼任參謀總長一段時間，推動與監督對日國防作戰計畫的擬訂。本文全面梳理參謀本部擬訂的國防作戰計畫，探討這些計畫擬訂者為誰？如何擬訂？計畫相互關係為何？演變脈絡為何？計畫有無引敵南下或移轉日軍作戰線的戰略企圖？最後討論開戰之後，計畫的初期實踐狀況。本文指出，相較於國軍基層參謀不受重視，最高層的參謀本部有所作為，在德國軍事顧問協助之下，實地考察全國要地，擬訂各層次的軍事計畫。這些計畫非僅紙上談兵，確能掌握日軍可能動向，並且在開戰初期付諸實施。於上海開戰係既定計畫，但計畫並無引敵南下的戰略企圖；鞏固西南根據地以備國軍節節西撤亦屬計畫一環，但開戰後對華北、沿江、沿海並不輕易放棄。參謀本部的規劃除了後來普遍認識的在廣大空間運動戰、游擊戰，更重視攻勢防禦、與敵決戰、反攻堅城，以及大規模的陣地戰。

關鍵詞：蔣中正、參謀本部、國防作戰計畫、法肯豪森、陣地戰

*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

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¹

《孫子兵法·計篇第一》

一、前言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一個月後演為全面戰爭。面對日軍的進攻，國民政府(以下或簡稱國府)已有準備。早在國民革命軍北伐途中、1928年5月，國軍便曾與日軍在濟南衝突，自是國軍領導人蔣中正(1887-1975)在日記開闢「雪恥」一欄，「每日必記滅倭方法一條」。²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軍攫取整個中國東北；1932年一二八事變，日軍復進攻中國經濟中心上海。對國府而言，日本全面侵略迫在眉睫，為即將到來的戰爭積極準備實屬必要。

國軍如何備戰？蔣中正的戰略規劃為何？相關研究已經有長期的積累。較早討論這些問題的是國軍自身，而影響力最大的著作係1978年三軍大學校長蔣緯國(1916-1997)總編著之《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10卷)。該書指出，國軍規劃一部兵力於華北方面遲滯敵軍，主力於長江方面積極行動，將日軍由北向南的主力吸引至淞滬方面，迫其主作戰線形成自東向西，國軍乃能採取空間換取時間，逐漸西撤，遂行持久。³

1 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上海：中華書局，1947)，〈計篇第一〉，頁56。

2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蔣中正日記》，2006C37，1928年5月6、9-10、12、14日。

3 蔣緯國總編著，《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第4卷，頁787、857；第10卷，頁2744-2749。蔣緯國尚於其他專書、論文或場合，說明此一戰略。

蔣緯國關於國軍引敵南下、移轉日軍作戰線的學說(「軸線移轉說」)，雖不是第一個提出，但影響最大，學界亦受影響，有提出商榷者，亦有支持者。中國大陸學界，更是自 1992 年余子道發表〈論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問題〉一文以來，展開熱烈討論。⁴另有一批研究，未針對上述問題意識，而是從國府備戰這樣的課題之下進行探討；⁵其中，馬振犢任職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得地利之便，參閱大量檔案，對此課題用力較深。⁶如此眾多的討論，呈現這個課題的確重要，因為這牽涉蔣中正如何準備、面對抗戰，同時解釋何以弱勢國軍得以與現代化日軍持久抗戰多年，相關討論至今仍具學術價值。

⁴ 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2：3(北京，1992.8)，頁 1-21。「軸線移轉說」的研究回顧，參見蘇聖雄，〈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國史館館刊》，46(臺北，2015.12)，頁 63-65。

⁵ 舉要如陳謙平，〈試論抗戰前國民黨政府的國防建設〉，《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87：1(南京，1987.1)，頁 23-31。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頁 222-225；劉維開，〈國民政府的備戰〉，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第 1 編，和戰抉擇(臺北：國史館，2015)，頁 218-225。Chang Jui-te, "The Nationalist Army on the Eve of the War,"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ited by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85-88。馬振犢，〈1936-1937 年國民黨政府國防作戰計畫剖析〉，收入《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頁 411-422。較新的研究，參見袁成毅，〈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對日本侵華軍事戰略之研判〉，《抗日戰爭研究》，2018：2(北京，2018.5)，頁 97-106。

⁶ 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頁 19-46。馬振犢同時為國軍有無引敵南下戰略學術討論的主要參與者。

本文延續此重要課題，另闢蹊徑，將最高參謀機關的作為引入視野。自十九世紀以來，最高參謀機關已成為列強高層軍事組織的核心，高層參謀提供統帥情報、準備計畫細節、轉達作戰命令、監督統帥意志之執行。⁷中國清末軍事改革，軍制仿西方、日本重新建立，亦設有相似組織。民國建立以後，此組織定名為參謀本部。由於民國初年制度不上軌道，參謀本部並未發揮作用；然而北伐以後參謀本部重新組成，改頭換面，開始有所作為。⁸蔣中正本人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位為人所悉，其實他也兼任參謀總長一段時間，推動與監督對日國防作戰計畫的擬訂。因此，以參謀本部所擬不同層次的國防作戰計畫為基礎，同時分析參謀總長蔣中正及參謀本部所倚重的德國軍事顧問的抗戰構想，當可為國府備戰的課題，提供另一角度的思考。

本文運用的史料，主要典藏於國史館及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後者尤其藏有大量參謀本部擬訂之國防作戰計畫，部分學者已有利用，惟尚未全面梳理分析。本文探討這些計畫擬訂者為誰？如何擬訂？計畫相互關係為何？演變脈絡為何？計畫有無引敵南下或移轉日軍作戰線的戰略企圖？開戰之後，初期實踐情況又為何？⁹

⁷ David T. Zabecki, *Chief of Staff: The Principal Officers behind History's Great Commanders*, vol. 1, Napoleonic Wars to World War I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8), 1-21.

⁸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臺北：元華文創，2018），頁 3-4、54-55。

⁹ 本文所謂「國防作戰計畫」，係包括各層次的軍事計畫，從區域性各要地的防禦計畫，到全國性的國防建設、作戰計畫。當時對於各計畫的稱呼，變化頻繁，並未固定，本文依參謀本部服務規程及當時較常出現的用法，概稱為「國防作戰計畫」。「修正參謀本部服務規程」（1936），〈參謀本部組織法令案〉，國史館藏，《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12071-00119-027。

二、國防作戰計畫擬訂之肇始

(一) 參謀本部的組織人事與國防作戰計畫

中國現代中央參謀機關的建立，需推至清末，時內憂外患不斷，自庚子之役(1900-1901)以後，清廷深感非改良兵制不足以圖強，乃於兵部外特設練兵處，以練兵大臣總理訓練陸軍事務，其下設協理等官，及軍政、軍令、軍學三司，各司分科治事。此一軍令司之成立，是為中央參謀機關設立之基礎。爾後兵部改制為陸軍部，納入練兵處及太僕寺等機關，並附設軍諮處及海軍部。軍諮處成立未久，宣統年間(1909-1911)仿德日制度，該處獨立於陸軍部之外，專掌軍令事宜，復改稱為軍諮府，是為中央最高參謀機關。¹⁰

民國建立以後，1912年5月，原南京臨時政府之參謀部與前清之軍諮府合併為參謀本部，直隸於大總統，統轄本部及全國參謀將校，監督其教育，並管轄陸海軍大學、陸海測量、各國駐紮武官、軍事交通諸事宜。參謀本部首長為參謀總長，特任職，地位很高，建國要人黎元洪(1864-1928)曾出任斯職。然而，由於袁世凱(1859-1916)與北京政府各軍系領袖不重視參謀本部，致該部徒擁虛名而無實力，並未發揮國防用兵的法定職掌作用。參謀總長、次長等職變動頻繁，部內職權遭各個軍政機關侵奪，又隨著北京政府財政困難加劇，職員薪津時常遭到拖欠，最後該部一無所事，人員星散。¹¹

¹⁰ 袁績熙編譯，《參謀業務》(南京：軍用圖書社，1933)，頁4-5。

¹¹ 胡寶華，〈北洋政府參謀本部瑣憶〉，《文史精華》，2001：11(石家莊，2001.11)，頁53-56；張建軍，〈民國北京政府參謀本部的內外人事與戰時

國民革命軍北伐底定，全國軍事機關改組，原北京政府參謀本部亦實行改造。1928年底，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廳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合併，接收北京政府參謀本部的案卷、財產等，於是年11月建立新的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其職掌為國防用兵及陸地測量事宜。該部首長稱參謀總長，其任務為統轄全國參謀人員，監督其教育，並管轄陸軍大學校及駐外使館武官及陸地測量；另置有次長，輔助總長整理部務。¹²

國民政府參謀本部重新成立以後，組織編制續有調整。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鑒於國防情勢急遽變化，為謀事權統一、指揮便利，國民政府於1932年6月將該部組織條例改為組織法，附以組織系統表、編制表，並另擬服務大綱。1935年8月，國府復明令修正參謀本部組織法。1936年6月，再修正服務規程及系統表，並廢止1935年8月公布之參謀本部系統表、編制表。¹³從1936年7月的編制來看，參謀本部總長、次長之下，有直屬高級參謀數人、總務廳、第一廳、第二廳，並轄陸軍大學校、陸地測量總局、陸海空軍駐外武官，本部編制員額計338人。¹⁴

指揮》，《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呼和浩特，2010.5)，頁83-87。

12 〈參謀本部條例〉(1928年11月22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軍事(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頁47。

13 「參謀本部致國民政府呈」(1932年6月27日)、「國民政府令」(1935年8月9日)、「國民政府致立法院公函」(1936年6月)，〈參謀本部組織法令案〉，《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12071-00119-003、001-012071-00119-023、001-012071-00119-028；陳長河，〈國民黨政府參謀本部組織沿革概述〉，《歷史檔案》，1988：1(北京，1988.2)，頁110-111。

14 「參謀本部編制表」(1936年7月8日)，〈參謀本部組織法令案〉，《國

參謀本部另轄有國防設計委員會，負責制訂全國國防之具體方案。該委員會於 1932 年底建立，蔣中正親兼委員長，翁文灝(1889-1971)擔任秘書長，副秘書長為錢昌照(1899-1988)。其初始主要工作，係以國防經濟的調查統計和與國防有關的工業技術研究為主，1934 年 9 月以後，重心轉向制訂各項具體的國防建設計畫。¹⁵至於本文所論國防作戰計畫，主要仍由參謀本部負責。

國民政府首任參謀總長為李濟深(1885-1959)，接下來依序為何應欽(1890-1987)、朱培德(1889-1937)。1932 年一二八事變後，蔣中正親自出任總長，擔任斯職一直到 1935 年底。此後直到中日全面戰爭爆發，改由程潛(1882-1968)出任。¹⁶總長的人選，皆為國府軍界資深要人，從國民革命軍北伐時的各軍領袖，可以觀察此一情態。當時組建六個軍，第一軍為中央軍嫡系，軍長初為蔣中正，後為何應欽；第二軍由湘軍編成，軍長譚延闓(1880-1930)；第三軍由滇軍編成，軍長朱培德；第四軍由粵軍編成，軍長李濟深；第五軍為粵軍另一部編成，軍長李福林(1872-1952)；第六軍以湘軍為主，軍長程潛。六個軍軍長，除譚延闓、李福林，爾後皆曾出任參謀總長。李濟深、程潛之任，並有安插非中央軍軍事領袖之意味。其他幾位總長皆屬中央軍系，何應欽為中央軍僅次於蔣中正的第二號人物，已為人所熟知。¹⁷朱培德係 1930 年

民政府》，典藏號：001-012071-00119-029。

¹⁵ 國防設計委員會於 1935 年 4 月改組為資源委員會，隸屬軍事委員會。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頁 41、133、492；盧勇，〈早期抗戰的重要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述略〉，《抗日戰爭研究》，2009：3(北京，2009.8)，頁 93-103。

¹⁶ 劉壽林、萬仁元、王玉文、孔慶泰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474-476。

¹⁷ 關於何應欽較新的研究，參見：Peter M. Worthing, *General He Yingqin: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alis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代蔣中正的重要軍事幕僚長，時常代蔣處理棘手事務，尤其是安撫地方實力派，其逝世時，蔣出席其國葬，觀其遺容不勝悲愴，感到「儕輩之喪，以益之(朱培德字)為最痛也」，蓋視之為左右手。¹⁸至於蔣中正本人，更是親兼總長近三年，每週嘗親赴參謀本部一、二次處理要公。¹⁹

參謀次長員額定兩名，其人事考慮除了專業、經歷，也著意於南北平衡。參謀本部重建之初的參謀次長為劉汝賢(1870-?)、葛敬恩(1889-1979)，前者係保定北洋陸軍速成武備學堂出身，在北京政府擔任過參謀次長、代參謀總長；²⁰後者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日本陸軍大學，北伐時追隨蔣中正，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參謀處長，「計劃作戰甚著勞績」。²¹劉、葛之搭配，具體呈現參謀本部南北政權合一的人事構成。

之後出任次長職者有鮑文樾(1892-1980)、李樹椿、黃慕松(1884-1937)、賀耀組(1889-1961)，皆具參謀專業，並且考慮派系平衡。鮑文樾，北京陸軍大學畢，東北軍系統，追隨張學良(1901-2001)，其替換葛敬恩出任參謀次長為蔣張合作的結果。²²李樹椿，西北軍系統，保定陸軍軍官

18 《蔣中正日記》，1937年2月17、20日、1938年1月16日；朱維亮，〈憶父親朱培德〉，《湖南文史》，2003：8(長沙，2003.8)，頁26。

19 沈雲龍、謝文孫訪問，謝文孫紀錄，〈征戰西北——陝西省主席熊斌將軍訪問紀錄〉，《口述歷史》，2(臺北，1991.2)，頁98。其中一年以親自指揮剿共之故，由朱培德代理。

20 馬永祥、尤文遠主編，《保定軍校千名將領錄》(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頁112。

21 〈葛敬恩〉，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入藏登錄號：129000035818A；外務省情報部編纂，《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1937)》(東京：財團法人東亞同文會，1937)，頁84。

22 樋口正德編，《最新支那要人傳》(大阪：朝日新聞社，1941)，頁189-190。

學校畢，曾任韓復榘(1890-1938)部參謀長，短暫出任參謀次長。²³黃慕松，廣東籍要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日本火炮工專門學校畢，曾參與辛亥革命，長期擔任北京政府參謀本部局長。²⁴賀耀組，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湘軍系統，北伐時投入蔣中正，長期擔任中央軍事機關要職。²⁵全面戰爭爆發前後的次長為楊杰(1889-1949)、熊斌(1894-1964)，前者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軍學淵博、才識縱橫為人所稱道，曾任蔣中正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²⁶後者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早歲長期任職北京政府參謀本部，後投入西北軍系，參謀本部重建後出任廳長，積功升至次長。²⁷

是時國軍頗為仰賴外國軍事顧問，參謀本部之下設有總顧問室，聘用許多日本顧問；九一八事變之後，改聘德國顧問以為代替，各顧問參與國防作戰計畫之擬議。²⁸1932年9月之時，本部總顧問室成員有總顧問佛采爾(Georg Wetzell, 1869-1947)，以及顧問史培曼(Spemmann)、顧德威(Gudevius)、布爾林(Boullin)、克魯格(Kluge)、布賽吉斯(Busekist)，除布爾林為俄國人(白俄)，餘皆德國人。²⁹

參謀本部第一廳與擬訂國防作戰計畫最為相關，該廳職掌「關於

23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增訂本)》，上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頁559。

24 〈黃慕松〉，國史館藏，《個人史料》，入藏登錄號：1280051580001A。

25 〈賀耀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入藏登錄號：129000098603A。

26 〈楊杰〉，《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入藏登錄號：129000098543A。

27 〈熊斌〉，《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入藏登錄號：129000093304A。

28 胡春惠、林泉訪問，林泉紀錄，《尹呈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頁38。

29 「參謀本部及附屬機關」(廿一年九月七日總務廳第一處調製)，〈參謀本部組織法編制表服務大綱和辦事通則〉，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以下簡稱《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575。

國防作戰計畫之擬製事項」、「關於兵要地理之調查編纂事項」、「關於要塞攸關之一切計畫事項」，³⁰其下第一處「掌理國防作戰動員計畫及要塞(陸海河等要塞)綏靖等事務」，為計畫核心擬訂單位。³¹擔任過第一廳廳長者有劉光(1893-1971)、黃慕松、王綸(1892-?)、張亮清(1881-?)、龔浩(1887-1982)，軍事教育完整，具相當軍事素養。劉光畢業於北京陸軍大學、日本陸軍大學，曾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顧問、第四軍參謀長兼代軍長、黃埔軍校代校長、南京軍官學校校長、陸軍大學校長，³²七七事變後，可以看到他在統帥部負責全國戰鬥序列的擬訂(詳後)。黃慕松前已提到，其擔任參謀次長前，短暫接替劉光任第一廳廳長。王綸畢業於陸軍大學，曾任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第一軍參謀長、軍事委員會參謀廳內之局長、參謀本部第三廳廳長，後來接任黃慕松任第一廳廳長。³³王綸之後，張亮清短暫接任廳長，他畢業於日本陸軍大學，曾任廣州大本營行營參謀、第三師師長、砲兵學校教育長、陸軍大學兵學教官。³⁴龔浩是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前最後一任第一廳廳長，陸軍大學畢業，長期追隨湘軍唐生智(1889-1970)，有唐氏私人諸葛之稱，曾任國民革命軍前敵總指揮部參謀長、第五十一師師長、第四軍軍長、參謀本部第二廳廳長，1936年4月接替張亮清任第一廳廳長。³⁵(表1)

30 「參謀本部服務規程」(民國二十五年七月十六日國民政府核準備案)，〈參謀本部組織法編制表服務大綱和辦事通則〉，《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575。

31 「參謀本部服務大綱」，〈參謀本部組織法編制表服務大綱和辦事通則〉，《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575。

32 〈劉光〉，《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入藏登錄號：129000084113A。

33 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頁102。

34 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九千將領》(蘭州：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3)，頁400。

35 〈龔浩〉，《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入藏登錄號：129000098793A；「參謀本部官佐軍職任免報告表」(1936年6月)，〈參謀本部第一廳職員

一般國防作戰計畫的擬訂流程，係由第一廳第一處(作戰處)負責，由處內主辦參謀擬訂，再由第一廳召集一部或全部人員，同時邀集各特種兵指揮部主辦參謀討論一次，然後上呈批准實施。³⁶戰前擔任第一廳第一處處長的尹呈輔(1892-1976)，在回憶錄提到九一八事變後他負責計劃抗日，工作異常忙碌，為了設計防線，經常冒著寒暑，不避風雨，陪同德國顧問克魯格到各地勘查地形，作為擬訂計畫之參考。³⁷

任免、晉用、調用的文書》，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軍委會參謀本部》，檔號：七六七-97。

³⁶ 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戰役〉，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遠征印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頁 156。

³⁷ 胡春惠、林泉訪問，林泉紀錄，《尹呈輔先生訪問紀錄》，頁 38-39。

表 1 參謀本部要員表

時間	總長	次長	德國總顧問	第一廳廳長	備註
1928.10.24- 1929.3.28	李濟深	劉汝賢 葛敬恩	鮑爾	劉 光	
1929.3.28- 1929.5.24	何應欽	劉汝賢 葛敬恩	克里拜爾	劉 光	
1929.9.11- 1932.3.16	朱培德	葛敬恩 李樹椿 鮑文樾 黃慕松	克里拜爾 佛采爾	劉 光	1929.5.24以後 由朱培德代 理，1929.9.11 實任
1932.3.16- 1935.12.18	蔣中正	鮑文樾 黃慕松 賀耀組 葛敬恩 楊 杰 熊 斌	佛采爾 塞克特 法肯豪森	劉 光 黃慕松 王 綸 張亮清	1934.12.7以後 由朱培德代 理，蔣中正名 義上仍為總 長，至1935.12. 18免職，同時 朱培德免代
1935.12.18- 1937.8.20	程 潛	楊 杰 熊 斌	法肯豪森	張亮清 龔 浩	

說明：表中人名示擔任過斯職者，非必同時擔任。
資料來源：劉壽林、萬仁元、王玉文、孔慶泰編，《民國職官年表》，頁474-476；國防部史政局編，《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工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9），頁16-17。

(二) 首部國防作戰計畫

1921年7月，國民政府所尊崇的中國國民黨總理孫文(1866-1925)，開始思考寫作《國防計畫》一書，以為宣傳之用，使全體國民了解孫

本人之救國計畫。³⁸惟 1922 年 6 月陳炯明(1878-1933)部砲擊廣州觀音山孫文之總統府，該書草稿與各種資料燬去，僅存綱目。³⁹國民政府既以繼承孫文遺教為旨，其國防計畫綱目與相關著作，自然為擬訂國防作戰計畫參考之所須。

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建立後，參考孫文各種著作，擷取其要旨，於 1929 年 4 月擬訂《中華民國國防計畫綱領草案》及《中國國防政策實施意見書》，規定國防永久計畫之大綱，作為國防各種事業規劃之標準。⁴⁰計畫綱領草案屬最機密，內容涉及極深入的軍事分析與部署，已脫孫文擬撰宣傳著作之性質，確屬國軍首部國防作戰計畫。

計畫綱領草案與實施意見書內容廣泛，其軍事作戰方面，另有國防作戰計畫。最晚於 1931 年 6 月，參謀本部已擬有《國防計畫草案》。該計畫之假想敵國，與前述之綱領相同，皆為日本。預想日軍之作戰方針為海陸並進，陸軍分三路，第一路藉海軍之誘掖與導引，直攻長江流域，而以南京為目標；第二路分二軍，一軍自朝鮮往北，一軍由大連等處上陸，均以奉天為目標，後者兼負中斷燕奉聯絡線之任務；第三路亦分二軍，一軍由青島上陸，一軍由登州附近上陸，均以濟南為目標，後者兼負中斷燕豫魯連絡線之任。日軍將再以海軍封鎖珠江口外。如是則國軍北方軍隊不得南下，南方軍隊不得北上，中部軍隊

38 「總理國防十年計畫書——民國十年年七月八日致廖仲愷函」，〈國防建設計劃大綱(周亞衛著)〉，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檔號：B5018230601/0029/570.3/6015。

39 孫文，《三民主義》(臺北：臺灣省訓練團，1946)，自序，原無頁碼。

40 「中華民國國防計畫綱領草案及中國國防政策實施意見書」(1929 年 4 月)，〈國防(一)〉，特交檔案，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典藏號：002-080114-00007-001。

將處孤立奮鬥之境。⁴¹

與後來國軍不斷強調持久戰不同，該計畫草案認為國軍利於戰爭之速決而不利於持久戰，並且利於取攻勢而不利於取守勢，然欲取攻勢攻擊，非有與日本對等以上之陸海空軍之兵力不可，該計畫認為陸軍至少須有日軍之六成，海軍須有其七成，養成如此兵力估計要三十年準備，才能發動攻勢攻擊。因此，計畫之國防方針規劃「專守防禦」、「攻勢防禦」、「攻勢攻擊」等三個時期。⁴²

該計畫所規劃之長期備戰與防禦，以及短期的進攻作戰，與後來的計畫不盡相同。不過計畫估算日軍的進攻方向，已與日本當時的計畫有相合之處。日軍曾於 1926 年制定年度作戰計畫，其對華部分，於中國東北方面作戰目標是平定南滿與北滿；華北方面準備在秦皇島、塘沽、天津及山東半島以足夠兵力登陸，占領河北及山東要地；華東方面在上海附近的長江沿岸登陸，其作戰方向依據實際情況決定；至於閩浙華南，則應具體形勢臨機處置。此外，日軍已有擴大戰爭的規劃，視情況以一部沿平漢線南下，與沿長江西上之一部相策應，在漢口附近進行作戰。為推動這項計畫，日本參謀本部作戰課長畑俊六(1879-1962)大佐率團乘軍艦溯江而上，偵查上海至漢口間的登陸點。⁴³因此，國軍的「國防計畫草案」雖未能全盤掌握日軍的計畫，已預知作戰重點將在東北、河北、山東半島、長江下游等地。當然，這不難猜測，這些地區皆屬海陸與日本接觸的第一線。不久，日軍果然於東北發動事端，然後接著進攻長江下游的上海。

41 〈國防計劃草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57。

42 〈國防計劃草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57。

43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頁 259-260。畑俊六後來在對華作戰扮演重要角色，先後出任中支那派遣軍司令官、支那派遣軍總司令官。

(三) 應付九一八、一二八危局的國防作戰計畫

九一八事變爆發未久，南京全市黨員反日救國大會，通過「請中央迅速確定國防計畫，並指定專款限期完成案」，案呈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南京特別市執行委員會將該案轉呈國民政府，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諭交參謀本部。除此而外，各方陸續呈送對日作戰計畫，供參謀本部等軍事機關採擇。⁴⁴參謀本部參考各方意見，研擬修訂國防計畫，至於其他軍事機關，也擬訂防衛計畫，以備日軍對京畿重地可能到來的攻擊，如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擬訂「防衛首都配備計畫案」，⁴⁵首都警備司令部擬訂「京滬警備計畫草案」等。⁴⁶

1932年初，戰火延燒到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上海為國府經濟重地，地近首都南京，1月29日，國府要員召開緊急會議，決議成立軍事委員會(以下或簡稱軍委會)，推蔣中正等為委員，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⁴⁷蔣提議政府由南京遷移至洛陽，以免受砲艦之威脅，並決心與日軍決戰。行政院院長汪兆銘(1883-1944)、國民政府主席林森(1868-1943)皆贊同蔣之決心，此議乃定。⁴⁸

1932年2月4日，蔣中正決定「全國防衛計畫」，以軍委會名義通令實施。該計畫將全國劃分為四個防衛區，首要目的為因應一二八

44 〈各方條陳國防計畫意見〉，《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25。

45 〈九一八事變後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有關南京防衛的命令計劃和通報〉，《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96。

46 〈京滬警備計畫草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98。

47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3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頁187。

48 《蔣中正日記》，1932年1月29日。

事變，重點在淞滬防衛，並規劃主動向東北出擊，牽制日軍。⁴⁹2月15日，軍政要員汪兆銘、李濟深、馮玉祥(1882-1948)、朱培德致電蔣中正，表示英、美、法調停能否奏效，尚未可知，此時日軍陸續運華，我軍卻增援困難，建議令全國從事防衛，並令乘機收復東北失地，同時令廣州、汕頭、青島等處向日挑釁，以分其力，勿使專注上海一隅。⁵⁰

軍政要員的建議，呼應「全國防衛計畫」既重防守又欲主動出擊的規劃。蔣中正未直接回覆他們的建議，而是不斷思索如何與日軍持久抗戰。先是，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未久、10月3日，蔣與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熊式輝(1893-1974)談備戰計畫，認為「無論此次對日與戰，而西北實為我政府第二根據地，萬一首都陷落，即當遷於洛陽，將來平時亦以洛陽與西安為備都也」。⁵¹當1932年2月初蔣撤抵洛陽之後，觀察當地地形，更感「遷都西北之必要」。⁵²他於2月25日，命軍政部部长何應欽從速準備第二期抗戰計畫，告以「決心與倭持久作戰，非如此不足以殺其自大之野心」；27日，復決定軍事計畫大旨：「充實一切自衛力量，準備長期抵抗，以求最後之勝利。」⁵³

3月1日，中國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於洛陽召開。5日，通過以長安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陽為行都，並組織陪都籌備委員會。⁵⁴又通過設置軍委會，設委員長1人，委員7

49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3冊(臺北：國史館，2004)，頁140-142。

50 「汪兆銘等致蔣中正函」(1932年2月15日)，〈淞滬事件(二)〉，特交文電，《蔣檔》，典藏號：002-090200-00006-218。

51 《蔣中正日記》，1931年10月3日。

52 《蔣中正日記》，1932年2月5日。

53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8)，頁182-183。

54 「提議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案」(1932年3月5日通過)，收入秦孝

至 9 人。⁵⁵同日，蔣閱中全會宣言稿，其詞有「全國軍隊應抱同一長期抗戰之決心」云云，因記所感「我計畫國防之實施準備、抗戰之持久事機萬端從此發軔，此等艱鉅，舍我其誰？」⁵⁶次日，蔣受任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⁵⁷15 日，又受命出任參謀本部參謀總長。⁵⁸

3 月 10 日，蔣前令何應欽擬訂之計畫完竣，是為「京滬路方面第二期抵抗作戰方案」。該案判斷日軍將以占領南京、控制長江流域為目的，國軍作戰方針以「保衛國土長期抵抗」為目的，以必要兵力占領陣地，阻止日軍前進，俟相當機會，採取攻勢，盡力包圍日軍於嘉定、昆山一帶地區而殲滅之。⁵⁹這個計畫沒有實施，因為前線軍事壓力已經緩和。1932 年 5 月，國府與日本簽訂停戰協定。不過，國軍對日國防作戰計畫之研擬並未終止，進入了下一個階段。

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9)，頁 281。

55 「關於軍事委員會案」(1932 年 3 月 5 日通過)，收入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頁 283-284。

56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 13 冊，頁 352-357。

57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 3 編，頁 194-196。

58 蔣並於 3 月 18 日，正式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與參謀本部參謀總長，通電就職視事。「特任蔣中正兼參謀本部參謀總長此令」(1932 年 3 月 15 日)，〈國民政府官員任免(二)〉，《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32102-00031-031；「蔣中正朱培德致國民政府電」(1932 年 3 月 18 日)，〈軍事委員會官員任免(二)〉，《國民政府》，典藏號：001-032107-00029-024。

5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 5 輯第 1 編，軍事(五)，頁 487-491。

三、中部國防計畫與沿江海之防禦布局

1932年5月5日，淞滬停戰協定簽訂，蔣中正開始策劃剿共軍事。事實上，軍政部長何應欽於4月19日，即奉命兼任贛粵閩邊區剿匪總司令。5月23日，蔣中正也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24日宣布就職。6月28日，剿共軍事核心的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正式於漢口成立。⁶⁰

當時基本國策，係「安內攘外」，惟「攘外必先安內」，蔣中正決定先剿共後抗日。⁶¹國策先後雖定，對日的國防計畫，始終沒有停止研擬。初始較為重視者，一為沿長江一帶，一為沿海岸一帶，當時並稱沿「江海」。兩地皆屬中國富庶區域，亦為國府政治、經濟核心地帶。蔣中正之所以選擇先行剿滅豫鄂皖的共軍，便是因為此地位處長江一帶，「遭此匪患，正是國家腹心之患」，若剿共成功，便可於此努力建設，抗拒帝國主義的壓迫。⁶²

(一) 中部國防計畫

沿江海之國防作戰計畫，最重要的是「中部國防計畫」。該計畫受到相當重視，係以德國顧問佛采爾所擬「中國中部(黃河—南京—

60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3編，頁217-218。

61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頁180-183。

62 「清剿匪共與修明政治之道」(1932年6月18日)，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頁620。

寧波線)防禦計畫」為母體，⁶³再經參謀本部研議修訂充實。其所謂「中部」，即江、浙、魯、豫、皖、贛等省，也就是所謂華中地區，後來又再加上閩省。⁶⁴1932年6月，蔣中正於漢口豫鄂皖三省剿匪總司令部，電南京參謀次長賀耀組：關於中部國防計畫及經費預算之數，與兵工廠製造計畫，請與軍政部政務次長陳儀(1883-1950)預商，待佛采爾回南京時，即開會妥商，決定著手開始日期，使不致延誤。⁶⁵

蔣對相關計畫十分關切，他檢閱參謀本部過去擬訂的「中華民國國防計畫綱領草案」，以及「國防政策實施意見書」，認為內容「皆較切實可行」，遂手諭參謀本部參考所規劃內容：雖然該計畫未從事實上切計期限、預算，但所擬集中與作戰地區可以參用，而今日情勢既變，計畫自亦有一部分之變更，尤其東北已失，其關內之計畫，仍可以此為原則。蔣接著指示參謀本部當前最重要之三項工作：第一、自本年起的每年度應調製對敵作戰計畫，本年務於8月10日製成呈閱。第二、確定決戰地區，集中主力殲滅敵軍於境內。第三、長江各省迅即劃定師管區與師管區內之步管區，蔣以為此項最急，應周密考察確定，又由於此制與地方團防制度有關，他要求沿長江各省之團防務必按國防計畫實施。⁶⁶

在蔣要求之下，參謀本部進一步修訂中部國防計畫。1934年底，

63 〈總顧問佛采爾擬：「中國中部(黃河—南京—寧波線)防禦計畫」(附圖)〉，《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73。

64 「中部國防建設計畫」(1934年)，〈中部國防建設計畫(底稿)〉，《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60。

65 「蔣中正致賀耀組電」(1932年6月21日)，〈革命文獻——國防設施(一)〉，《蔣檔》，典藏號：002-020200-00023-001。

66 「抄錄總長手諭」(1932年7月23日)，〈蔣介石對國防計畫及各地軍事設施指示之函電〉，《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59。

該計畫形成兩個版本，一為強調國防建設的「中部國防建設計畫」，一為作為作戰指導的「中部國軍作戰計畫」。

「中部國防建設計畫」之目的，係「盱衡國情，斟酌緩急，自宜先行樹立基礎，爾後再謀漸次擴充，庶幾事易舉而收效宏」，於是先於政治、經濟及戰略中心之地區，如江、浙、魯、豫、皖、鄂、贛等省，依作戰計畫之要求，就國力之可能，為最低限度之建設，整個計畫完成時間為5年。⁶⁷

「中部國軍作戰計畫」判斷日軍一旦開戰，必以其占東北而侵熱河之兵力，進窺平津而南下，或利用其優越之制海權，於中部沿海及長江下游上陸作戰。就後者而論，該計畫以長江為界，劃分南、北戰地。在北戰地日軍以濟南為作戰目標，魯北方面，估計日軍以占領平津後之主力，由津浦鐵路向濟南，以一部向黃河下游齊東、蒲臺之線協同攻擊前進；魯東方面，由青島、威海、煙臺、龍口各地上陸，沿膠濟路向濟南攻擊前進；徐海方面，由海州方面上陸，向徐州攻擊前進。該計畫認為，日軍如占領平津，則其主力必向魯北方面，否則必向魯東方面，至於徐海方面之行動，則為斷國軍南北之連絡，以策應其主力作戰。南戰地則日軍將以南京為作戰目標，其可能行動，初於上海方面上陸後，其陸軍由京滬鐵路、其海軍於長江協同，向南京攻擊前進。如上海方面作戰頓挫時，則由乍浦、澉浦方面上陸，進占杭州，再由京杭國道向南京攻擊前進。綜合南北戰地的可能戰況，日軍之主作戰究在北方戰地或在南方戰地，將視平津方面之情況而定，惟無論以何戰地為主作戰，其他一方面的戰地必同時有支作戰之行動。針對上述敵情判斷，「中部國軍作戰計畫」國軍作戰方針為「按攻勢

⁶⁷ 「中部國防建設計畫」(1934年)，〈中部國防建設計劃(底稿)〉，《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60。

防禦之方法，以一部警戒沿海、沿江之要地，以主力集結於其後方之要地，相機擊破當面之敵」。⁶⁸

「中部國軍作戰計畫」規劃範圍後來擴大，原先不包括福建，後來予以納入。先是，蔣中正於 1934 年 2 月 13 日，電參謀次長賀耀組，令其確定「東南國防計畫」之範圍、步驟與先後建築之時期次序，以及各期經費之數目，訂定一整齊方案，俾按步實施。⁶⁹爾後蔣續有指示，令參謀本部「迅將北至海州、徐州、歸德，南至溫州、贛州之東南國防計劃製成！」復指示「江海各要塞，應先定一中南北西各區之整個方案，與修築步驟之計劃。」參謀本部遵照指示立即分別計劃，詳加檢討，並屢經修改，擬訂成帙。關於東南國防計畫者，就「中部國軍作戰計畫」增加福建部分完成草案；關於江海各要塞者，擬訂為「中部沿江海各要地整備草案」；並於中南北西四區之外，擬加閩區一區。⁷⁰又為配合中部國防的實施，參謀本部擬訂「中部國防植樹計畫」，該計畫目的，係對空及地上遮蔽之需要，於中部國防有關之地區，按其所要之程度，分期施行植樹造林。經費由實業部提供，辦理植樹時期每年自 1 月中旬至 4 月中旬止，於 1935 年開始限 3 年完成。⁷¹

68 〈中國中部國軍作戰計畫(鉛印本)〉，《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24。

69 「蔣中正電賀耀組限期製竣東南國防計畫並速呈參謀本部等總報告」(1934 年 2 月 13 日)，〈籌筆——統一時期(一〇四)〉，《蔣檔》，典藏號：002-010200-00104-015。

70 「軍事委員會呈文」(1934 年 11 月 14 日)，〈蔣介石對國防計劃及各地軍事設施指示之函電〉，《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59。

71 〈中部國防植樹計劃及參謀本部城塞組關於國防造林問題的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89。

(二) 沿江海之防禦布局

「中部國防作戰計畫」規劃沿江、沿海的整體防禦，至於江海各要地，另有區域性的防守計畫。這些計畫，或是參謀本部所擬訂，或為地方駐紮部隊研擬後呈報參謀本部核定；概略區分，主要是京滬、山東、徐海、武漢等地的計畫。其數量非常龐大，全面羅列這些計畫將遠超過本文篇幅，因此以下以重點概述方式，呈現各要地之計畫演變。從內容可知，國軍視這些區域為日軍進攻重點，因此必須整備固守。

京滬是沿江海的計畫重點。上海為國府經濟中心，並且地近京畿，戰略地位重要，該地復有日本租界，日軍得以於此駐軍，易於挑起事端，一二八事變已給國軍深刻的體驗。面對可能再起之事變，淞滬警備司令部於 1932 年底擬訂呈報「應付上海日軍方案」，參謀次長賀耀組批示：「極秘，存卷。用為補助中部防禦計畫之附件，指令應依敵情之變遷，隨時制定新計畫。」⁷²至於首都南京，南京警備司令部於 1933 年 2 月擬訂「首都警衛計畫」，⁷³並有更牽涉細節的「南京警備實施計畫草案」，⁷⁴1934 年復擬訂「南京防守計劃」。⁷⁵德國顧問也參與規劃，製成「南京方面之防禦方案」，蔣中正閱後批示：「照此方案，會谷司令(按：憲兵司令谷正倫[1890-1953])負責準備，並將此批之

72 「淞滬警備司令呈軍事委員會」，〈中國北部(黃河以北)防禦方案(附圖)(附日軍侵犯冀熱形勢圖)〉，《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72。

73 「首都警衛計畫」(1933 年 2 月)，〈南京警備司令部呈報之南京警衛計劃〉，《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93。

74 「南京警備實施計畫草案」(1933 年 4 月 8 日)，〈南京警備司令部呈報之南京警衛計劃〉，《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93。

75 〈南京防守計劃〉，《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95。

件亦由谷司令與該機關切實施行並劃分期限，確定計畫與步驟列圖表呈報。」⁷⁶由於京滬為國家重地，除此而外之相關計畫數量非常多，如防止敵軍阻斷大江交通，預先擬訂之渡河準備計畫。⁷⁷

山東方面。該地之青島、濟南以及膠濟鐵路沿線，有上萬日本僑民，日本在此並有高額投資，因此日方十分重視保障該地之權益，國民革命軍北伐時，日軍曾兩次派遣部隊從青島上陸(「山東出兵」)，沿膠濟鐵路西進濟南。⁷⁸上述國府參謀本部的「中部國軍作戰計畫」，已預測日軍可能再次登陸山東，青島、威海、煙臺、龍口等山東東部口岸，皆為可能上陸地點，登陸日軍將沿膠濟路向濟南攻擊前進，並與自河北南下的日軍向濟南合擊。當時山東由西北軍將領、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掌握，中央政令未能深入，惟面對日軍可能的進攻，蔣中正仍以參謀總長名義，電韓復榘指示山東綏綬南北，地居衝要，為預防日軍覬覦煙、青，及確保津浦之交通，令將今後之作戰方針、預想作戰時地理兵力之配備等情形詳密呈報。韓復榘接電後，於1932年6月15日擬訂「山東防衛計畫」、「山東省防計畫及所需之各種補給」上呈。⁷⁹參謀本部自身亦擬訂「山東軍(第三集團)作戰計畫草案」、「山東方面軍作戰計畫」等計畫。⁸⁰全面戰爭爆發前幾個月，蔣中正又飭

76 「南京方面之防禦方案」，〈「南京方面之防禦方案」及「對敵襲擊首都之防禦要領」〉，《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94。

77 「軍事委員會致參謀本部快郵代電」(1934年12月13日)、「首都上下游渡河準備計畫」，〈參謀本部擬訂南京上下游渡河計劃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80。

78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頁274-276、280-282。

79 〈韓復榘呈報山東防衛計劃及所需之各種補給〉，《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16。

80 「山東軍(第三集團)作戰計畫草案二十五年年度」、「山東方面軍作戰計畫」，〈山東軍作戰計劃草案及附圖〉，《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46。

「將青島及濟南與兩地國防工事及固守計劃詳細設計」，參謀本部遂又擬就「民國二十六年度山東區第一方面軍作戰計畫」呈核。蔣於 1937 年 5 月前後仔細閱讀該計畫，在上面親批文字，如作戰方針一節之上，親批：「作戰方針第一著應確實占領各上陸點，直接阻敵登陸；第二著乘敵登陸兵力分離之際，各個擊破之；第三著固守最後抵抗陣地線，相機轉移攻勢將敵殲滅。」參謀本部據以修正，並派員前赴濰河陣地線工事進行實地偵查標定，著手構築，惟至盧溝橋事變前幾天(1937 年 7 月 3 日)，濟南、煙臺、龍口附近工事，及平度、高密一帶工事，均尚未實地偵查及標定。⁸¹

徐海方面，即徐州至海州一帶，此地居於淞滬與山東青島中間。徐州縮穀南北，為軍事要害，其東之海州，地理環境優越，經海陸至日本距離較近，商貿往來便利，北京政府於 1919 年於此建設大國際貿易港，可通 1 萬噸級外洋船舶。隨著隴海鐵路線延長與貨物增加，原港埠已感不足，國民政府遂於 1933 年在此建設連雲港，1934 年 10 月完工開港。隴海鐵路自西安、鄭州通達海州，是中國唯一橫斷大陸東西的鐵路，戰略地位異常重要。連雲港之開港，對於商貿固然有益，卻也儼然闢一門戶給日軍。⁸²國府參謀本部判斷，日軍為犯中原，逼迫首都南京，必先圖占領登陸便利之海州，再西進占領戰略要點之徐州，如是可斷華北軍之補給及國軍南北之連絡，進一步策應其主力方面之作戰。⁸³有鑑於此，參謀本部積極研擬防禦計畫。早在 1932 年 9

81 「民國二十六年度山東區第一方面軍作戰計畫」、「參謀本部呈軍委會」(1937 年 7 月 3 日)，〈一九三七年度山東區第一方面軍作戰計劃〉，《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47。

82 滿鐵調查部，《連雲港經營現狀／概要卜對策案》(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1)，頁 1-8。

83 〈修正徐海地區防禦方案綱要及計劃〉，《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07。

月中旬，德國總顧問佛采爾便呈送「海州防禦方案」，防敵由海上上陸攻擊，同時對付敵由北方、自山東前來的攻擊，⁸⁴蔣中正於該方案批示「除重砲須另購外，其餘皆可照方案設計工作可也。」⁸⁵參謀本部內之江海防務研究委員會，並根據佛采爾的意見，整理釐定「海州防守計畫」。⁸⁶1934年9月，參謀次長賀耀組偕時為副總顧問的法肯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1878-1966)，以四天時間，偵察海州、連雲港。法肯豪森認為過去的防禦草案，專注在防範日軍在海州沿岸各可能之上陸地點，並於陸上設置多層防線，卻沒有專注連雲港本身的設防，德顧問因此以為「前此一切關於海州(連雲港)防禦草案之指導要領，完全不適用於今日」，連雲港「絕對有設防之必要」，遂重撰報告，闡述防禦要領。⁸⁷參謀本部仔細分析法肯豪森的報告，將法肯豪森與佛采爾的意見截長補短予以折衝，完成「修正徐海防禦方案綱要」。⁸⁸此外，參謀本部又僅針對徐州防禦，訂有「徐州附近地區防禦方案」。⁸⁹從上述諸多計畫，已可見參謀本部對於徐海之重視，產製許多計畫，爾後該部仍不稍輕懈，繼續派員考察。⁹⁰

84 「海州防禦方案」(1932年9月中旬)，〈修正徐海地區防禦方案綱要及計劃〉，《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07。

85 此批示批於該方案封面。「海州防禦方案」(1932年9月中旬)，〈修正徐海地區防禦方案綱要及計劃〉，《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07。

86 〈海州防守計劃〉，《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08。

87 「民國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視察海州—連雲港之報告」，〈修正徐海地區防禦方案綱要及計劃〉，《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07。

88 「修正海州防守計畫之意見」、「第一處簽呈」(1935年4月6日)、「修正徐海防禦方案綱要」，〈修正徐海地區防禦方案綱要及計劃〉，《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07。

89 「徐州附近地區防禦方案(附圖)」，〈修正徐海地區防禦方案綱要及計劃〉，《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07。

90 「關於連雲港航泊問題會勘報告」，〈參謀本部制訂海州防禦方案的有關

武漢方面，此地處江漢平原之中，扼長江中流，踞江漢之交，且為平漢、粵漢兩鐵路之銜接點。三大城市中，漢口當水陸交通要衝，商業極盛；漢陽為軍事工業區，有漢陽鐵廠、兵工廠、火藥廠等；武昌為政治樞紐，溝通南北。該處地理之重要，與地勢之險扼，足以控制南北，威懾全國。⁹¹另外，漢口關有日本租界，有為數不少的日本僑民及駐留日軍，可說是日本向中國內地滲透和擴張的據點。⁹²國府參謀本部針對武漢形勢，考慮武漢濱臨長江，開戰後渡河運輸有可能為日軍阻斷，為此於 1935 年 7 月研擬「武漢上下游渡河準備計畫」。⁹³武漢城防更是國軍建設重心，國軍重要將領陳誠(1898-1965)出任軍委會委員長行營陸軍整理處處長親駐武漢，於 1936 年擬有「武漢城防實施計畫」⁹⁴，以及「武漢城防作戰計畫」，後者判斷日軍一旦實行攻略，勢必以海、陸軍沿長江深入，藉其各地潛在之勢力為內應，攻入腹心，而收內外呼應之效。國軍作戰方針，以鞏固武漢城防之目的，應先以優勢兵力，出敵不意，肅清敵人潛在武漢之勢力，同時配置相當兵力於武漢周圍，協同江防砲兵拒止敵之登陸。攻擊奏功後，如敵有增援到來，則因應情勢，再轉移兵力於預選之陣地，求敵主力而殲滅之。⁹⁵

文件》，《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06。

91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武漢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頁 11-12。

92 梁紫蘇，〈簡述漢口日租界〉，《武漢文史資料》，2006：7(武漢，2006.7)，頁 53-55。

93 〈武漢上下游渡河準備計劃(附圖)〉，《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81；〈參謀本部擬訂南京武漢長江上下游沿岸各渡河點計劃的文件〉，《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79。

94 「武漢城防實施計畫」(1936 年)，〈國防設施計畫(二)〉，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04-002。

95 〈武漢城防作戰計劃〉，《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59

上述淞滬、山東、海州、武漢為江海防禦關鍵要地，除此而外尚有其他日軍可能登陸進攻的地點，如鎮江、江陰、寧波、乍浦、澉浦、福建等，參謀本部皆派人前赴考察，擬訂防禦計畫。⁹⁶對於全國各要地的防禦方法，參謀本部十分重視構築防禦工事與建設要塞。為推動全國防務，1933年底自本部之下成立城塞組，以參謀次長賀耀組兼任主任，組下設三股一處，各自負責專管業務。⁹⁷其計畫到執行過程，係先由參謀本部第一廳派員至前線視察規劃，所擬計畫經核定後，移城塞組參考執行，這個過程並有德國顧問參與其中。以福建的防禦計畫來說，參謀本部派第一廳一位處長朱偉赴福建視察，其返還後，於1934年4月擬具「福建沿海海防計畫」並附圖冊，呈本部核批。次長賀耀組批示：「擬由本廳第一處彙辦後，移城塞組參考。」⁹⁸兩個月後，德國顧問顧德威又前赴福建視察，撰寫三部報告書，復依法肯豪森之指示，完成一份補充意見，呈報賀耀組查閱。⁹⁹

另有一處的計畫特別值得一提，即杭州灣沿岸的乍浦、澉浦。參謀本部判斷，日軍為進攻杭州或策應其上海方面之作戰，必於杭州灣方面企圖上陸。這個預想相當正確，開戰後最大規模的會戰——淞滬會戰兩軍僵持之際，日軍便是由此上陸，抄襲國軍背後。此時參謀本部經實地勘查，判斷杭州灣的乍浦或澉浦附近地形適合登陸，最有可

⁹⁶ 尚有海軍、空軍計畫，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戰史會檔》多有收入，本文以篇幅限制，不一一羅列。

⁹⁷ 陳長河，〈國民黨政府參謀本部組織沿革概述〉，頁111。

⁹⁸ 〈參謀本部朱偉草擬之福建沿海海防計劃及附屬圖〉，《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86。

⁹⁹ 「視察福建報告書第一部」、「赴閩視察報告第二部」、「赴閩視察報告第三部」、「福建視察報告書之補充」，〈蔣介石聘請德國顧問顧德威視察福建防禦工作的報告書〉，《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362。

能是日軍侵襲地點，再就此二處比較，乍浦之位置較為突出更為可能，因此擬訂「乍浦澉浦方面防守計畫」。¹⁰⁰德國顧問也對該地防務提出意見，擬具「乍浦澉浦海岸區防禦方案」，同意「中國中部國軍作戰計畫」內聲明敵軍有在乍浦—澉浦區內上陸，與上海方面攻擊前進同時並舉之可能，建議在該區部署各砲及相關設備。蔣中正閱後批示：「方案內各種砲類另行設法，與交通設備一項由浙省府承辦外，其餘如探照燈、水雷、通信器材等，約一百廿萬元，應由參謀部限期籌備實施也。」¹⁰¹爾後參謀本部持續重視該區之防備，將「乍浦澉浦水陸防禦之再研究」列為 1937 年 4 月預定工作，參謀本部處長朱偉再度前赴實地查勘，擬訂「乍浦、澉浦水陸防禦補充計畫草案」，然後移第一廳第一處進行研究。¹⁰²

四、全國國防作戰計畫的演變

(一) 對華北的重視

相較於華北軍系複雜，國府中央勢力始終無法有效掌握，長江、沿海為國府核心區域，可以理解參謀本部為何擬訂包括「中部國防計畫」等為數眾多的沿江海計畫。由是則國府國防作戰計畫看似不重與

100 「乍浦澉浦方面防守計畫」，〈乍浦、澉浦方面防守計劃及海岸區防禦方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13。

101 「乍浦澉浦海岸區防禦方案」，〈乍浦、澉浦方面防守計劃及海岸區防禦方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13。

102 「第一廳第五處簽呈」(1937年4月13日)、「第一廳第一處簽呈」(1937年4月23日)，〈乍浦、澉浦方面防守計劃及海岸區防禦方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13。

日軍在華北大戰；實則，華北之軍事地位，為參謀本部重中之重。

1932年10月，國防大學校長楊杰(1934年12月出任參謀次長)薦舉史國英(1898-?)，附呈其所著「鞏固國防之芻議」，長篇論述國防要義、方針、策略，提出國防戰略。其主張採攻勢防禦，向東北進攻，並特別強調當時尚未失陷的熱河國防地位之重要。¹⁰³史國英的建議呈現他對北方戰場的重視，而這樣的想法並非特例。同年11月初，參謀本部總顧問室呈送「中國北部防禦方案」，亦強調華北的軍事地位。該方案並未署名，不過以其係總顧問室之報告，推知應為德國顧問之建議。該方案指出國軍在華北應戰雖有困難，但仍應將「主戰場」(原文稱「本戰地」)置於此，若與日本交戰，建議於平津迤北之線進行防禦。該方案特別反對在平津線迤南決戰，因為如此則不僅放棄北方重要都市北平及重要商埠天津，並且亦放棄北寧鐵路，同時將使敵軍能從容調集重兵。¹⁰⁴

除了上述德國顧問之報告，另一總顧問室顧問克魯格，也與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一處成員親赴各地勘查地形，擬具偵查報告，供參謀本部參

103 「鞏固國防之芻議」(1932年10月15日)，〈國防設施報告及建議(三)〉，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55-001。或是讀了史國英的報告，蔣中正於該年12月指示何應欽派史國英協助在華北的軍政部參事嚴寬。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7冊(臺北：國史館，2005)，頁716-717。然而其人在歷史上並未留有大名，僅知其為陸軍大學特別班第二期畢業，1936年升任少將。1944年蔣中正曾於召見後記「史國英(軍)似可用」。《蔣中正日記》，1944年2月28日；南京圖書館編，《中國近現代人物像傳》(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207。

104 〈中國北部(黃河以北)防禦方案(附圖)(附日軍侵犯冀熱形勢圖)〉，《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72。

考。¹⁰⁵參謀本部即據以研擬「根據克魯格顧問偵查報告後之建議方案」。該方案對於日軍開戰後，國軍即退至黃河南岸之計畫不以為然，認為國軍若迅速撤退，不啻予日軍莫大的行動自由，其優勢兵力得以抽調他處；因此，國軍有必要在黃河迤北作戰，由濟南向北攻擊。方案指出，據偵察結果，黃河以北地形完全平坦，水涸期內容水甚淺，甚至完全無水，不足為攻者障礙，惟村落周圍樹木甚多，影響視線，足以減少重武器及砲兵之效力，因此就地形觀察，黃河以北頗便於防禦。¹⁰⁶

由於開戰後日軍極可能從華北南下，參謀本部對華北的防禦十分重視，即便國府核心區域在長江流域，參謀本部人員與德國顧問仍頻繁於華北考察，設計國防作戰計畫，並且將之視為主戰場。這樣重視華北的規劃，後來與重視江海的計畫合而為一，形成以全國為範圍的國防作戰計畫。當然，這有一個演變過程。

(二) 1932-1935 年的全國國防作戰計畫

如既述，1932 年一二八事變爆發之際，最早擬訂的全國性國防計畫為 1932 年 2 月的「全國防衛計畫」。事變平息之後，參謀本部持續研議，就在 1933 年初長城戰役、榆關與熱河失守以前，參謀本部完成一份「對日作戰計畫」，詳細規劃華北若發生戰事的部署。與「中部國防計畫」重視沿江各省不同，該計畫係全局性的計畫，由其內容判斷，計畫可能制訂於 1932 年底。本文為便於區別後來的計畫，稱作「對日作戰計畫(1932)」。¹⁰⁷

¹⁰⁵ 胡春惠、林泉訪問，林泉紀錄，《尹呈輔先生訪問紀錄》，頁 38。

¹⁰⁶ 「根據克魯格顧問偵察報告後之建議方案」(1932 年 11 月)，〈國防設施報告及建議(二)〉，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54-001。

¹⁰⁷ 〈對日作戰計劃(在東北已淪陷熱河未失之時研擬有蔣介石批語)(附日軍侵

「對日作戰計畫(1932)」判斷日軍將向熱河進攻，同時以大部兵力向平津出動。面對日軍的進攻，國軍作戰方針為於冀熱邊境作韌強之抵抗，此後視情況之遷移，做逐步之抗戰，迨敵深入後，將主要交通機關施行破壞，以妨害其增援。¹⁰⁸蔣中正仔細閱讀該作戰計畫，對之不甚滿意，以為計畫「過于理想，不切實際」，如計畫欲固守榆關、秦皇島，拒止敵之南下及上陸等，蔣以為「不適平津與北寧路之現狀」。此外，該計畫未充分考慮江海防禦，蔣批示「開戰後長江之運輸，決不能如所計之易，既無制海之武器，又無制空之武器，如作戰計劃而不將彼我之質量切實比例，則一切妙算皆成畫餅而已」。他要求必須研究日軍長江艦隊、各地租界等問題。¹⁰⁹對於蔣加強沿江防禦的指示，參謀本部將其規劃放進後來的全國國防作戰計畫，以及中部國防計畫等沿江海的計畫之中。

「對日作戰計畫(1932)」擬訂未久，日軍向榆關、熱河、長城隘口、察東、冀東等處進軍，是為長城戰役，中日兩軍局部熱戰，由於未引起全面戰爭，「對日作戰計畫(1932)」並未施行。1933年5月30日「塘沽協定」簽訂，局勢表面緩和，實則日本對華北的威脅與日俱增。6月1日，蔣中正電負責華北的何應欽(兼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即召集各將領會議，確定今後華北國防計畫」。¹¹⁰參謀本部也重新研擬國防計畫，於該年夏季訂定「國防作戰計畫」、「國防作戰計畫綱要草

犯冀熱形勢圖)》，《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21。

108 〈對日作戰計劃(在東北已淪陷熱河未失之時研擬有蔣介石批語)(附日軍侵犯冀熱形勢圖)〉，《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21。

109 〈對日作戰計劃(在東北已淪陷熱河未失之時研擬有蔣介石批語)(附日軍侵犯冀熱形勢圖)〉，《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21。

110 「蔣中正致何應欽電」(1933年6月1日)，〈革命文獻——長城戰役〉，《蔣檔》，數位典藏號：002-020200-00016-152

案」、「作戰計畫」；這些皆屬全國性的計畫。

「國防作戰計畫」並不是一部完整的作戰計畫，著重在區分防地；¹¹¹「國防作戰計畫綱要草案」亦著重國防區劃。¹¹²兩則計畫，就防地區分而言，有重複、不同或相似之處，之所以分成兩份計畫，或為計畫尚在討論，並未定案，因此兩案並存，計畫內容也較為簡略。至於同時擬訂的「作戰計畫」，內容則較為詳細，可說是參考修改自長城戰役前的「對日作戰計畫(1932)」，係較完備的計畫，為便於對照，本文稱作「作戰計畫(1933)」。

「作戰計畫(1933)」的敵情判斷，認為日軍陸路將由冀北榆關、古北口兩路直逼平津，一部由多倫進攻察綏；海路方面，判斷山東半島與海州及上海等地，為日軍上陸要點。鑒於如此敵情，應對方針為「以國軍主力集結於魯冀察境，防止敵之侵入，並相機求其主力擊破之，乘勢恢復失地，以一部警備江海岸，並肅清長江及各要地之敵勢力」，計畫主戰場在華北，江海岸方面則實行警備並主動肅清日軍各據點。此一方針，幾為爾後各全國性國防計畫所延續。該計畫並遵照先前蔣中正對「對日作戰計畫(1932)」不足的批示，加入「長江內之敵艦，由沿長(江)各地警備部隊協同要塞部隊及海空軍擊滅之，並於沿江各險要處配置游動炮兵施行要(腰)擊」，以及「各地日租界之武力，由各該地警備部隊於適當時機採用非常手段撲滅之」等規劃。此外，「作戰計畫(1933)」另以較大篇幅，規定戰鬥序列及兵團部署，這方面的規劃在「對日作戰計畫(1932)」已有，此時內容更為詳細。¹¹³

111 「國防作戰計畫」，戚厚杰選輯，〈1933年國防作戰計畫〉，《民國檔案》，2006：4(南京，2006.11)，頁18-19。

112 「國防作戰計畫綱要草案」，戚厚杰選輯，〈1933年國防作戰計畫〉，頁18-19。

113 「對日作戰計畫」，戚厚杰選輯，〈1933年國防作戰計畫〉，頁21-26。

1933年夏季的國防作戰計畫擬訂之後，持續進行修訂。該年底，參謀本部研擬「防衛大綱」，於12月29日開會討論。該大綱可說綜合夏季計畫三案，所著重者在分區、防線、軍團部署，也就是強調「防衛」，與先前各案相比，有修訂、也有縮減。¹¹⁴「防衛大綱」與前述「作戰計畫」皆屬廣義的國防作戰計畫的一部分，前者重視防衛，後者強調軍事作戰。此「防衛大綱」的出現，是參謀本部就「防衛」擬定全國國防計畫的開始。

1934年，參謀本部又就先前作戰計畫，研擬充實，另訂一份「作戰計畫」，本文稱「作戰計畫(1934)」以示區別，該計畫係於「作戰計畫(1933)」基礎上增補。兩份計畫相較，可有下列幾點認識：第一、「作戰計畫(1934)」補充更多內容，如在日軍侵入區域之判斷，加上「敵為掌握臺灣海峽計，漳、廈及閩江口三都澳，亦為其企圖占領之區域」；在國軍作戰方針，加上「另以國軍大部迅行勦滅赤匪，俾得以國軍全力與敵作持久戰」，亦即將現勢補入計畫之中。第二、強調運用民力，如在冀省的指導要領，規定「將平東各縣保安隊、保衛團加以整頓充實其裝備，並予以特種教育，其各縣之民眾，應遵照民眾訓練實施辦法施行，加以軍事訓練，用為戰時之別働隊」；於結論復強調「充實河北北部地方之武力，並加緊民眾之訓練」。第三、作為全國性的計畫，首次提到防空防毒之準備。第四、「作戰計畫(1933)」的戰鬥序列，擬於華北編成6個軍團，「作戰計畫(1934)」則直接以現有軍進行部署。第五、「作戰計畫(1934)」更強調後勤，規劃後方設備、交通、通信、補給、衛生等事宜。第六、「作戰計畫(1934)」的「結論」很長，分述「根據本計畫之研究應切實準備各項」，如開戰初期應先肅清長江內敵艦及各地敵租界之武力、速成江陰南京陸地防禦工事、速成徐海防

¹¹⁴ 〈防衛大綱(塘沽協定以後所定)〉，《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71。

禦工事、計劃山東濰河西岸防禦陣地、速成平津張防禦工事、作戰軍平時駐地之確定等項。¹¹⁵

1935年初，參謀本部延續先前就「防衛」部分研擬計畫之方式，擬訂「民國二十四年度防衛計畫大綱」。計畫之方針，係集結國軍實力於既設陣地之各經濟要區，堅固防守，與敵長期抗戰。蔣中正細閱該計畫大綱，於原呈隨頁批示，並於1935年2月7日手諭應改正及注重各點，如關於沿江海之戰術，諭示「應取積極攻勢，若其強大主力部隊已登陸完畢，則應改取守勢，照預定之防禦陣地，作持久戰」。由於在蔣中正批閱該大綱之際，剿共軍事有很大的進展，共軍受到嚴重損失，已於1934年底退出贛南，向西南轉移。蔣因此於批示中提到：「一俟贛南匪區肅清，於五月間控制剿匪主力軍於長江南北兩岸為預備隊，隨時增援於各方面。」¹¹⁶

「攘外必先安內」是蔣中正基本政策，隨著剿共軍事的成功，先前規劃的諸多國防作戰計畫之先期實踐更趨緊迫，蔣中正益加積極於完備與推動各項計畫，這從他當時的電令可見一斑。1935年2月12日，蔣電參謀次長楊杰並轉軍委會辦公廳主任朱培德、訓練總監唐生智，告以先前手擬之防衛方案應已送達，請依此規定各區局部防衛計畫及其局部工事，詳細繪成工事圖，令各省與其駐在各部隊實施與平時演習。¹¹⁷同日又電河南省政府主席劉峙(1892-1971)，應迅作滎陽、汜水線以西至洛陽、新安間北沿黃河南依嵩山山麓之整個防衛計畫，並令洛陽軍分校與駐洛各部隊，依計畫規定各地區實施局部演習，限本

115 〈1934年度作戰計劃及附圖〉，《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30。

116 「民國二十四年度防衛計畫大綱」，〈1935年度防禦計劃大綱及蔣介石之批示(抄件)〉，《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75。

117 「蔣中正致楊杰電」(1935年2月12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四年(九)〉，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207-025。

年5月內完成，其他開封、鄭州、歸德、蘭封沿黃河之重要地點，亦應仿此製成局部防戰計畫與永久工事。¹¹⁸

劉峙遵照蔣之指示，繪製防禦工事報告上呈，並派中央陸軍軍官學校洛陽分校主任祝紹周(1893-1976)赴京與參謀次長楊杰磋商。同時，蔣核定上述之「民國二十四年度防衛計畫大綱」，頒布施行，河南當局即派員赴南京參謀本部承抄攜回，詳細偵查計畫規定之各城市核心工事，以及沿黃河要點構築之堡壘，繕製報告。劉峙並電蔣中正執行情況。蔣對沿黃河之防禦，頗為關心，詳細批復劉峙來電，指示於洛陽與開封兩地附近，多備官船皮筏，以備戰時使用。¹¹⁹

與其他計畫一同，「民國二十四年度防衛計畫大綱」經不斷修訂，¹²⁰參謀本部並派員至各地宣述防衛計畫。1935年10月，參謀次長熊斌(1894-1964)赴北平與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1887-1959)談國防作戰計畫，此時修訂的計畫，就華北部分分為冀察區、晉綏區、山東區，以隴海線為最後抵抗線。開戰初期，規劃以宋哲元(1885-1940)、商震(1888-1978)等守平津，晉綏軍分守雁門及娘子關，倘平津放棄，宋、商退守保定、滄州之線，中央軍進至漳河之線收容之，同時晉軍進據太行山以側擊敵人，其後依實際情形，使整個陣線形成西倚太行，東沿黃河，最東之線則漸以徐州為倚軸而達於海。¹²¹

118 「蔣中正致劉峙電」(1935年2月12日)，〈革命文獻——國防設施(一)〉，《蔣檔》，典藏號：002-020200-00023-037。

119 「劉峙致蔣中正電」(1935年7月1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三十五)〉，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462-022。

120 如11月18日，參謀本部擬有「防衛計畫綱要甲案」。「防衛計畫綱要甲案」(1935年11月18日)，〈1935年度防禦計劃大綱及蔣介石之批示(抄件)〉，《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75。

121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1935年10月14-15日，頁317-318。

從 1932 至 1935 年的諸多全國國防作戰計畫，可見參謀本部的計畫不斷調整並愈趨嚴密。江海為國府重心，但全國國防計畫不僅江海，對於華北在內的全國防禦皆有慮及。

(三) 1936 年的全國國防作戰計畫

就在開戰前兩年的 1936 年，參謀本部完成「民國二十五年國防計畫大綱草案」、「作戰計畫」(以下稱「作戰計畫(1936)」)、「國防設施計畫綱要草案(二十五年)」、「民國二十五年初步動員計劃草案」。4 份計畫皆屬全國國防作戰計畫，只是重點不同，依序著眼於防衛、作戰、設施與工事、動員，參謀本部的整體規劃，可說益趨成熟。

「民國二十五年國防計畫大綱草案」延續先前以「防衛」為核心的計畫，將全國分為若干區，與過去幾部國防作戰計畫相比，該計畫特別重視政略的作用，規劃之開戰時期，「最好是預想敵國(按：日本)在西北利亞酣戰時(按：與蘇聯戰爭)，則國軍進出黑山白水之間，一舉收敵殲滅之」，但不得已受日軍襲擊時，則抗戰區內之國軍，盡力抵抗，求時間之餘裕，「以待國際間之變化」。該計畫明確提出苦撐待變的對日戰略，強調游擊戰、山地戰、夜戰等戰法，並重視外交的作為，「宜施多邊外交，俾國際間多助於我」。¹²²

「作戰計畫(1936)」延續歷年所擬的作戰計畫，判斷日軍主力將利用於華北，同時於青島、連雲港、長江杭州灣、福州、廈門等處，掩護其陸軍之一部任意登陸。計畫的作戰指導要領，為戰略上取守勢、戰術上取攻勢，即各地區守備隊若發見敵之弱點，斷然轉取攻勢，將敵各個殲滅，並應多採游擊戰術。¹²³

122 〈1936 年度國防計畫大綱草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68。

123 〈1936 年度作戰計畫〉，《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31。

「國防設施計畫綱要草案(二十五年)」著重在規劃陣地、工事，陣地線位置對於工事之程度、種類、式樣，有清楚的規定。如程度方面，在各陣地線內之核心，依戰術上之著眼，分為重要、次要及再次要之三種，重要者採用永久工事(以鐵筋混凝土構築)，次要者採用半永久工事(以應用材料如鐵軌枕木等)，再次要者採用臨時工事(用輕易之材料臨時構成之)，其各核心間之空隙，臨時以野戰工事連絡之。該計畫並規劃以四川為作戰總根據地，長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為作戰根據地，長江以北以太原、鄭州、洛陽、西安、漢口為作戰根據地。¹²⁴

「民國二十五年初步動員計畫草案」，為戰前少見關於全局動員的計畫。該計畫係規劃人員、兵器、彈藥、糧秣、衛生等之動員準備。開戰初期，預定動員出征軍 100 個師，晉綏作戰區預定使用兵力 12 個師，冀察作戰區預定使用兵力 16 個師，山東作戰區預定使用 6 個師，江浙作戰區預定使用 23 個師，福建作戰區預定使用 8 個師，廣東作戰區預定使用 14 個師，總預備軍預定為 21 個師，總數約 140 萬人，任後方勤務者約 70 萬人，合計 210 萬人。為達成各作戰區持久作戰之能力，該計畫並規定各地彈藥、糧秣儲備數量。從其動員部署之內容，可以推知參謀本部對各作戰區的重視程度。也就是說國府核心區域江浙確為防禦重心，投入之軍隊與後勤資源很多，但是華北的晉綏、冀察乃至於山東，亦皆為防禦重點。(表 2、3、4)。¹²⁵

¹²⁴ 〈1936 年度國防設施綱要草案〉，《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1969。

¹²⁵ 〈1936 年初步動員計畫草案(附戰鬥序列及戰場區分表)〉，《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10。

表2 各戰區人馬數目概計表

作戰區	約計師數	人員概數	馬匹概數	備考
晉綏作戰區	12	252,000	36,000	一、每師人員約 14,000。
冀察作戰區	16	336,000	48,000	
山東作戰區	6	126,000	18,000	
江浙作戰區	23	483,000	69,000	二、每師馬匹約 3,000。
廣東作戰區	14	294,000	42,000	三、每師需要服 後方勤務之人 員約為7,000。
福建作戰區	8	168,000	24,000	
總預備軍	21	441,000	63,000	
總計	100	2,100,000	300,000	

資料來源：〈1936年初步動員計劃草案(附戰鬥序列及戰場區分表)〉，《戰史會檔》，
檔號：七八七-2110。

表 3 彈藥分儲倉庫與數量表

華北區		
西安總倉庫	應預儲9個師之彈藥數量	華北區各彈藥倉庫為補充晉綏、冀察、山東各作戰區。
洛陽總倉庫	應預儲5個師之彈藥數量	
信陽總倉庫	應預儲4個師之彈藥數量	
太原支倉庫	應預儲5個師之彈藥數量	
蚌埠支倉庫	應預儲3個師之彈藥數量	
濟南支倉庫	應預儲5個師之彈藥數量	
華中區		
武昌總倉庫	應預儲5個師之彈藥數量	華中區各彈藥倉庫為補充江浙及山東各作戰區。
南京支倉庫	應預儲3個師之彈藥數量	
杭州支倉庫	應預儲2個師之彈藥數量	
華南區		
南昌總倉庫	應預儲6個師之彈藥數量	華南區各彈藥倉庫為補充江浙、福建、廣東各作戰區。
延平支倉庫	應預儲2個師之彈藥數量	
曲江支倉庫	應預儲2個師之彈藥數量	

資料來源：〈1936年初步動員計劃草案(附戰鬥序列及戰場區分表)〉，《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10。

表 4 糧秣分儲倉庫與數量表

倉庫所在地	預儲糧秣數量並預定補充之作戰區域
西安總倉庫	應預儲20個師3個月之糧秣，為補充總預備軍並晉綏、冀察、山東各作戰區之給養。
洛陽支倉庫	應預儲8個師3個月之糧秣，為補充冀察、山東各作戰區之給養。
太原支倉庫	應預儲4個師3個月之糧秣，為補充晉綏作戰區之給養。
蚌埠支倉庫	應預儲8個師3個月之糧秣，為補充山東、江浙各作戰區之給養。
濟南支倉庫	應預儲3個師3個月之糧秣，為補充山東作戰區之給養。
武昌總倉庫	應預儲20個師3個月之糧秣，為補充江浙、福建各作戰區之給養。
南京支倉庫	應預儲5個師3個月之糧秣，為補充防衛南京附近各部隊之給養。
南昌總倉庫	應預儲20個師3個月之糧秣，為補充總預備軍、江浙、福建、廣東各作戰區之給養。
延平支倉庫	應預儲6個師3個月之糧秣，為補充福建、廣東各作戰區之給養。
曲江支倉庫	應預儲3個師3個月之糧秣，為補充福建、廣東各作戰區之給養。

資料來源：〈1936年初步動員計劃草案(附戰鬥序列及戰場區分表)〉，《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10。

1936年參謀本部的四份國防作戰計畫，側重點各有不同，合而觀之，已可見國軍的整體戰略，採戰略守勢、戰術攻勢，開戰後重視華北的主動進攻，及江海之防禦，重點設防日軍可能的登陸點青島、海州(連雲港)、上海等地，並主動撲滅日本租界軍力。若與敵作戰不利，則改採持久作戰，節節後撤至後方陣地，運用游擊戰等戰法打擊消耗敵軍，最後以後方各重要城市為作戰根據地、以四川為總根據地，其間注意政略的運用。整個計畫，顯示參謀本部對持久戰整個進程已有規劃。

(四) 移轉日軍作戰線的討論與法肯豪森的戰略構想

考察全國國防作戰計畫的演變，可見參謀本部對於全局規劃有一定想法，然而實際上，其業務仍有與軍政部等相關機關執掌不清的狀況；¹²⁶至於國防計畫，初始也難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有缺乏架構、重複規劃的情形。例如前述一二八事變後，蔣中正下令軍政部長何應欽擬定作戰計畫而非參謀本部，即呈現軍政部與參謀本部業務上並未劃分清楚。此情態經過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與蔣中正的督導改組，參謀本部業務方有顯著進步，漸上軌道。¹²⁷

於是，從全局的作戰計畫，到重視華中防禦的中部國防計畫，再到各要地的京滬、山東、徐海、武漢防禦計畫，可見從中央到地方連續的計畫體系。參謀本部每年皆擬定業務大綱，當中呈現該年度須擬定的國防計畫。例如，1936年參謀本部的業務大綱，其計畫一為「國防整備建設計畫及實施程序之擬定」，項下便從擬定國家總動員方案、年度作戰計畫、初步動員計畫，到擬定各軍會戰計畫、江防計畫、沿江海及主要交通線國防各要地警備方案等。¹²⁸至於各主要作戰計畫，也將範圍內的區域計畫納入其子計畫，如「中國中部國軍作戰計畫」便將「山東方面軍會戰計畫」、「徐海軍作戰計畫」、「南京警備區戰鬥計畫」等納入附件。¹²⁹

126 「德總顧問佛采爾建議書」(1933年2月14日)，〈國防設施作戰計畫草案及蔣介石軍事手令抄件等〉，《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26。

127 「德總顧問整理部隊意見書」(1933年5月23日)，〈德籍顧問佛采爾關於發展中國陸軍的意見書〉，《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059。

128 「參謀本部民國二十五年度業務大綱」，〈參謀本部業務大綱〉，《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556。

129 〈中國中部國軍作戰計劃(鉛印本)〉，《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24。

國防作戰計畫確實呈現參謀本部規劃的對日戰爭如何進行，然而擬定過程，仍有許多不同看法，這些討論並未放在成文計畫之中，移轉日軍作戰線的討論是其中最重要者。當時，國府權力所及地區在長江中下游一帶；對於華北則有力有未逮之感。1934年4月底，蔣中正正在廬山與德國軍事總顧問塞克特(Hans von Seeckt, 1866-1936)討論對日國防戰略，提到對日國防重點區域應在長江流域而不在華北。他準備中日一開戰，便放棄華北而集中全力保衛長江流域。蔣並對華北感到悲觀，認為自己未能控制住黃河以北地區，以為「北方軍無用，不同於南方軍隊，隴海線以北的人，對政治不感興趣，他們甚至不知道日本人是敵人」。因此，蔣決定只用16%的軍事預算於華北，僅選擇戰略要點構築國防工事。他又表示，從政治上來看，長江以南遠比以北地區重要，況且華北的地方實力派軍隊沒有任何軍事價值。¹³⁰

蔣除了對長江流域十分重視，隨著國軍往中國西南省分追擊共軍，他也將更多注意力置於西南，尤其是四川。1935年，中央軍勢力進入西南各省，國軍獲得對日抗戰的廣大後方，是年7月9日，蔣在日記記云：「對倭以長江以南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線，以洛陽、襄樊、荊宜、常德為最後線，而以川、黔、陝三省為核心。」¹³¹

這樣特別強調西南、西北大後方的戰略，後來發展為移轉日軍作戰線的戰略。也就是全面戰爭爆發後，日軍必由河北向平津及其以南進攻，國軍準備於上海主動開戰，誘導日軍作戰線由北向南轉為由東向西，國軍便可獲得節節西撤的廣大縱深。相關討論，在國軍內部已不是秘密。不過一開始的討論，是有節節西撤，但並未預定要在上海主動開戰；對於最後根據地，也不一定是四川，而有不同的說法。例如，

130 塞克特反對這個看法，支持向華北進軍。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頁312-313。

131 《蔣中正日記》，1935年7月9日。

1935年8月，第十三師師長萬耀煌(1891-1977)，參加國府中央為統一川滇黔三省軍官意志的峨嵋軍官訓練，於日記提到此次訓練之宗旨，在於對日開戰後「最初我或可小勝，以後就不得不向內地撤退，引敵深入，至平漢路以西地區，作持久戰，嗣後由根據地反攻」。¹³²同年10月15日，參謀次長熊斌至華北宣述參謀本部對日作戰計畫，與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商談，徐於日記註記熊斌所言：「蔣先生看定日本是用不戰屈中國之手段，所以抱定戰而不屈的對策。前時所以避戰，是因為與敵成為南北對抗之形勢，實不足與敵持久，自川黔勦共後，與敵可以東西對抗，自能長期難之」¹³³由兩則日記，可見自國軍中央勢力進入西南之後，蔣中正、參謀本部一直到區域性的軍官訓練團，皆曾提到作戰線的問題，並強調西部各省的重要，至於其內容，則不見得提到於上海開戰引敵南下。

當時參與機宜的陳誠，在回憶錄也有相似說法，受論者廣為引用。陳說道，1936年10月，他與蔣中正等人於洛陽策劃抗日計畫，討論了持久戰、消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等基本決策，其討論結果為敵軍入寇，利於由北向南打，而我方為保持西北、西南基地，利在上海作戰，誘敵自東而西仰攻，而最後國防線，應北自秦嶺經豫西、鄂西、湘西以達黔、滇，以為退無可退之界限。¹³⁴

依據陳誠回憶，移轉日軍作戰線的戰略，最晚於1936年10月已然成形。不過，陳之回憶所述，與他當下的戰略建議，其實有所落差。當時日軍侵略綏遠日急，陳主張在此與日軍大戰，並非上海；至於全

¹³² 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上冊(臺北：湖北文獻社，1978)，頁255。

¹³³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3冊，頁318。

¹³⁴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頁23。

國根據地，他主張在湖南，而非日後的四川。¹³⁵

主張以湖南為根據地，陳誠並非唯一。軍事理論為人讚譽的蔣方震(百里, 1882-1938)，其持久戰略為後人所稱道，¹³⁶據其弟子龔浩回憶(1887-1982, 全面戰爭爆發時的參謀本部第一廳廳長)，早在戰爭爆發二十年前，蔣百里便強調中國應以「三陽」為根據地，也就是洛陽、襄陽、衡陽；¹³⁷其中，湖南是全國軍事基礎，其歷史地理與民風猶如中歐之普魯士。¹³⁸

因此，從諸多史料的記載得以知曉，國軍內部確曾討論作戰線的問題，但「如何」移轉日軍作戰線、在「何處」開戰、「最後根據地」的選擇等問題，仍有不同說法，未如陳誠回憶錄所示，於1936年10月已獲基本決定。相關戰略係於高級將領之間討論，為蔣中正或國軍對日作戰構想的一環，並未形諸文字成為正式計畫。¹³⁹

上述國軍內部討論之中，部分或有開戰後即向後退的意涵，德國軍事總顧問法肯豪森對此不以為然，向蔣提出不同意見。法肯豪森是德國軍事總顧問中待在中國最久者，早在1900年便因義和團事件隨德國前參謀總長瓦德西元帥(Alfred von Waldersee, 1832-1904)率遠征軍到中

135 蘇聖雄，〈陳誠的抗戰戰略新探〉，《中華軍史學會會刊》，23(臺北，2018.12)，頁123-138。

136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頁185。

137 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上海：中華書局，1948)，頁215。

138 龔浩，〈蔣方震百里先生之生平風格〉，收入蔣復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第6輯(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頁263-264。關於以湖南為根據地，又見薛光前，〈蔣百里的軍事思想〉，收入蔣復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頁162-163。

139 馬振犢，〈平心靜論「八一三」〉，《抗日戰爭研究》，2001：1(北京，2001.2)，頁114。

國。後來返國歷練軍職，於參謀大學畢業，並曾派駐東京擔任德國駐日軍事武官，對於日本陸軍的觀察較為豐富。1933年11月接替佛采爾擔任代總顧問，1935年3月實任總顧問(其間尚有塞克特擔任總顧問)，一直到全面抗戰爆發初期，他一直於國軍任職，提供軍事建議，在蔣中正身邊有一定分量。¹⁴⁰

1935年7月31日，法肯豪森當面向蔣中正陳述全局戰略。8月25日，法肯豪森復將種種想法撰成報告，呈送蔣「應付時局對策」一篇，述及國際現勢、日軍心理，並建議全盤對日戰略。這篇對策，為諸多論著所引用，以之強調國府對長江流域的重視，或作為國軍規劃移轉日軍作戰線的論據；其實，通觀整篇文章，法肯豪森是以相當篇幅，駁斥開戰即向後撤退的戰略。¹⁴¹

法肯豪森指出，長江地位相當重要，日軍若能控制長江直至武漢一帶，則中國國防已失一最重要之廣大根據，整個中國截然二分。也因此，或有人主張開戰起始，即將主抵抗線退至沿平漢路之線，所有前地直至海岸，任由局部部隊抵抗，而惟固守南京與南昌。他認為，此種戰法「足使沿海諸省迅速陷落」，並使「國外向後地之輸入，完全斷絕，最要之城市與工廠，俱相繼陷落」，於是陸軍所必需之裝備武器勢必迅即告罄，無大宗接濟之來源，屆時四川若還未工業化自造必需品，處此境況「必無戰勝希望，而不啻陷中國於滅亡」。並且，若前方部隊知曉決戰地在數百公里之後方，必定精神不振，戰鬥力衰減，而距前方稍遠之精銳部隊，自知孤立無援，必遭失敗。他還認為，

¹⁴⁰ 國防部史政局編，《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工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9)，頁16-17。

¹⁴¹ 「應付時局對策」(1935年8月25日)，〈國防設施報告及建議(二)〉，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54-002。

日軍作戰方式為驅逐國軍，使入川境山地，然後固守整理奪得之富庶地區，國軍若不全力奮鬥以求生存，華北全部包含山東在內，必定脫離中國。日本將扶植溥儀於北平，中部另設政府於南京，而兩廣之獨立，必益形鞏固。¹⁴²如是，非特日方分化與控制中國之目標可達，且將造成他國顧慮切身利益，不得不予以事實上之承認。法肯豪森甚至認為，「於內地各省繼續戰事，實際毫無用處，非惟無人視為中華民族之代表，並且視為和平破壞人」。¹⁴³

由於目前國軍主力因追剿共軍之故，俱集中於南部與西部，法肯豪森主張宜速抽調兵力，分駐各區，作戰取戰略守勢且採內線作戰。考慮日軍主要威脅來自東、北兩方，作戰部隊宜集中於徐州、鄭州、武漢、南昌、南京區內，由該區速向各方集中。北方須掩護隴海路暨沿路有關生存之設備，故最初部隊須向北推進，「滄縣—保定之線，宜絕對防禦」，以保全通往山西之主要交通，不使山西初戰時即失陷。最後戰線為黃河，宜作有計畫之泛濫，增厚其防禦力量。東部方面，所重一為封鎖長江，一為警衛首都。此外，南昌—武昌為主支撐點，亦應全力固守，維護向廣州之交通，即維護對外輸入線。至於最後防地，則為富庶又地形安全的四川。由是，法肯豪森認為國軍應向前方應戰，萬不可不戰而放棄寸土；如此向前強烈抵抗，仿 1932 年淞滬及古北口等處之成例，方能引起與長江流域有利害關係之列強採積極態度。¹⁴⁴

142 按當時兩廣設有中國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自外於南京蔣中正為首的黨中央及國民政府。

143 「應付時局對策」(1935 年 8 月 25 日)，〈國防設施報告及建議(二)〉，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54-002。

144 「應付時局對策」(1935 年 8 月 25 日)，〈國防設施報告及建議(二)〉，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54-002。

1937年4月9日，法肯豪森又呈送蔣「北正面防務之研究」，再度重申向前作戰的重要性，並且突顯華北的軍事地位。報告指出，「北正面為中國最重要之防禦正面」，該方面主正面位於渤海灣與太行山脈之間，右翼絕對警戒山東，左翼須於晉北、察綏兩省有妥確之支撐。國軍平時應於北正面駐守強大兵力，以應局部動作所需，且能於必要時既可迅速進占冀察兩省，亦可準備陣地承受攻擊，以獲調集強大兵力之時間餘裕。惟受事實上之限制，中央軍目前尚不能駐防冀省，故掩護軍主力應駐紮於魯豫兩省北部。開戰後，無論取攻勢或守勢，總宜努力使主力首先推進至滄縣—保定之線，並應考慮用急襲手段，消滅塘沽、天津、北平各地之日本駐屯軍。¹⁴⁵

質言之，法肯豪森十分重視於第一線抵抗，並強調華北在全局抗戰中的地位。由於蔣中正曾對總顧問法肯豪森的前任塞克特提到他要放棄華北，法肯豪森的建議或可說是針對這點而來，希望逆轉蔣個人的戰略構想。從前述國防作戰計畫的擬議，德國顧問皆積極參與，且法肯豪森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描述他在蔣面前的地位：「現在我……已經參與一切，而如果沒有我，就甚麼也不會發生，委員長要求我決定，並且依我的決定發命令。由於我始終有所準備，所以命令也總是貫徹下去」；¹⁴⁶推論法肯豪森的長篇意見，應該可獲蔣的高度重視。法肯豪森的「應付時局對策」於1935年年中提出，參謀本部其後的國防作戰計畫，對華北防禦的重視、開戰後的主動攻擊、作戰根據地的規劃等，與法肯豪森的建議相似，法肯豪森或已達成其目的，促使國軍的

145 「北正面防務之研究」(1937年4月9日)，〈國防設施報告及建議(三)〉，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55-003。

146 「馮·法肯豪森和中國作戰部隊的改編」(1934年12月)，收入郭恆鈺、羅梅君主編，許琳菲、孫善豪翻譯，《德國外交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頁170。

國防計畫延續一直以來的規劃，皆不擬放棄華北、沿海，並視前者為主戰場，而這或也是引敵南下、移轉日軍作戰線的戰略並未寫入成文計畫中的一個原因。

五、開戰前後的計畫與實踐

(一) 全面抗戰前的全國國防作戰計畫

繼 1936 年各份計畫之後，參謀本部奉命擬訂「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畫」，1937 年 1 月完成「甲案」、「乙案」兩份稿本，3 月修訂完畢，經參謀總長程潛等審定後，送往廬山，由軍政部次長陳誠轉呈蔣中正審閱。兩份國防計畫，是全面戰爭爆發前，參謀本部所擬訂的最後版本，可說匯總修訂了 1929 年以來，國軍的各式國防作戰計畫。

「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畫」甲案(以下簡稱「甲案」)中，判斷日軍將從黃河迤北發動進攻，速戰速決，將國軍向西北貧瘠之地壓迫，並利用其絕對制海權，由膠州灣、海州等處登陸，以威脅國軍黃河北岸作戰軍之側背。同時，日軍將以有力部隊，在長江下游太湖附近地區登陸，挫折中國經濟工業中心及首都所在地。面對日軍的進攻，開戰之初國軍「主力」置於河北滄州—河間—保定之線(滄保線)，保持重點於平漢路方面，對經北平—天津之敵軍「實行決戰」；若開戰之初，國軍主力不能進出滄保線，則主力改使用於德州、束鹿、石家莊附近之線(德石線)，仍保持重點於平漢路方面，對敵進行「第一次會戰」；又若國軍不能進出德石線，則國軍的冀察綏部隊，逐次占領預定陣地，行持久戰，遲滯敵軍前進，於既設陣地實行「攻勢防禦」。至於江海防禦，山東半島、海州方面，國軍直接阻止敵軍登陸，不得已時，逐步後退固守後方之線。長江下游地區之國軍，於開戰之初，應全力占

領上海，「無論如何，必須撲滅在上海之敵軍，以為全部作戰之核心」，爾後直接沿江海岸阻止敵之上陸；不得已時，逐次後退占領預設陣地，以拱衛首都。作戰期間，應有專門機關指導民眾，組織義勇軍、別動隊，採游擊戰術，牽制敵軍，擾亂敵軍後方。此外，死守城防有其必要；後撤時，「應利用現有之城垣，尤以天津—北平—青島—上海—福州—廣州等名城，配置守備部隊，死力固守」。¹⁴⁷

綜而言之，「甲案」作戰計畫係採守勢作戰，同時發揮攻擊精神，在華北與日軍決戰或會戰；不得已時，再實行持久戰，逐次消耗敵軍戰鬥力。計畫亦考慮日軍對沿海的可能進攻，以撲滅上海日軍為沿海防禦之核心，惟國軍主戰場仍在華北；上海方面之作戰，係為擊滅敵軍登陸之企圖。

至於「民國廿六年度國防作戰計畫」乙案，亦以華北為重心，而較「甲案」更顯積極。國軍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撲滅日本在中國之各占領地，並瓦解日軍於沿海登陸之企圖。在華北，攘擊日軍於長城迤北之線，並乘良好時機，以主力進攻東北。¹⁴⁸該案目標遠大，單獨以國軍之力難以實踐，或為假定世界大戰爆發時，日軍與其他列強開戰，國軍趁此機會發動攻勢，收復失土。

考察「民國廿六年度作戰計畫」甲、乙兩案可知，於上海開戰移轉日軍作戰線的戰略雖曾經過討論，但並未具體化為成文計畫。全面戰爭爆發前的國防作戰計畫，仍是在華北發生戰事後，將中央軍迅速

¹⁴⁷ 馬振犢選輯，〈國民黨政府 1937 年度國防作戰計畫(甲案)〉，《民國檔案》，1987：4(南京，1987.11)，頁 40-52。〈1937 年作戰計畫(甲)〉，《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32。

¹⁴⁸ 馬振犢選輯，〈國民黨政府 1937 年度國防作戰計畫(乙案)〉，《民國檔案》，1988：1(南京，1988.2)，頁 34-41。〈1937 年作戰計畫(乙)〉，《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33。

推進至華北滄保等陣線，與敵決戰、會戰。亦即，重視「空間換取時間」、不重一城一地的死守，或先行撤退、創造廣大活動空間的運動戰，並非作戰計畫所強調。相反的，計畫係強調法肯豪森所主張的向前方作戰，採取攻勢防禦，作戰不利之時，重視工事，死守大城，欲在既定陣線、城防上打擊、阻擊、消耗日軍。

計畫之呈現，似有違反常識之感。戰前蔣中正明明強調四川等西部各省的戰略價值，藉剿共名義中央軍進入四川，鞏固後方，戰前最後的作戰計畫卻對四川等地毫無所及。「甲案」雖有規劃主動出擊不利之後的備案，但並沒有謀劃得太過長遠。對於華北戰事不利將節節抵抗的後方陣地有所考慮，但在長江流域，並未規定上海戰事不利後更向後方南京、南昌、武漢乃至四川重慶等長江重要城市撤退的部署。從之前的中部國防計畫或 1936 年的幾份計畫，已可看到參謀本部對於這些地方的防禦十分重視，已有所準備，何以在戰前最後的計畫不見蹤影？

從九一八事變以來國防作戰計畫的演變，可以說明這個問題。參謀本部的全局國防作戰計畫，基本上是隨時間過去愈趨嚴密，種類也隨之增加，如 1936 年的計畫，有專注國防建設者（「國防設施計畫綱要草案(二十五年)」），有專注動員者（「民國二十五年初步動員計劃草案」），亦有重視防衛或作戰者（「民國二十五年國防計劃大綱草案」、「作戰計畫(1936)」）。目前所見 1937 年的兩份全局計畫，係專注在作戰，是 1932 年以來以作戰為主題的計畫之延續，其前身為「對日作戰計畫(1932)」、「作戰計畫(1933)」、「作戰計畫(1934)」、「作戰計畫(1936)」，俱見前述。這系列的計畫重點在開戰之初的部署，至於開戰一段時間之後，情境必定有不意之變化，屆時勢必適應情況頒布新的作戰計畫。因此，1937 年開戰前的作戰計畫，並不需要規定得如此長遠；較長期的規劃，係置於關於國防建設的計畫之中。至於作戰計畫以外的建設計畫或動員

計畫在 1937 年未有所見，或是因為年中戰事即已爆發，參謀本部尚未修訂完成，該年的計畫種類乃未若 1936 年完備。

(二) 開戰前計畫的實踐

參謀本部歷次的國防作戰計畫，並非空中樓閣、紙上作業，確按計畫進行部署、建設，雖然截至七七開戰前後，事先應進行的準備工作遠未完成。

就作戰兵力而言，戰前國軍雖有 182 個步兵師、9 個騎兵師等部隊，但編制裝備教育等尚未達到一定程度，各單位之戰鬥力不盡相同，加以需考量維護地方治安，預定僅能投入第一線步兵約 80 個師、騎兵 9 個師等部隊。就全國防禦工事而言，以首都為中心，逐次向國境線推進，其構築方式，係首先完成各陣地之骨幹，再依經費狀況分別緩急，逐漸加強，完成工事已有不少，未完成或根本未開工者亦多。¹⁴⁹就彈藥存儲而言，開戰前後，長江北岸各地存儲共約 6 千萬發子彈，武昌約 4 千萬，南京 1 萬萬發，以 20 個師計算，可供作戰 3 個月之用。此情態尚未符合 1936 年動員計畫，所需兵力與彈藥皆有不足，也未依計畫將更多彈藥運儲華北，七七後幾天，兵工署長俞大維(1897-1993)乃建議「應先將一部(彈藥)運過黃河分散屯儲」。就糧秣而言，準備也未完成，開戰前後僅存儲 50 萬人、10 萬匹馬糧秣 1 個月分，與戰前計畫規定的 210 萬人、3 個月糧秣相差遠甚。就倉庫的設置而言，已較 1936 年動員計畫更顯充實，開戰初期已有金陵、蚌埠、信陽、華陰、南昌、武

149 「對五屆三中全會軍事報告」(1936 年 7 月至 1937 年 2 月)，收入何應欽編，《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上冊(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8)，頁 2-18；「國防各項工程進度報告表」(1937 年 3 月 4 日)，〈國防設施報告及建議(四)〉，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56-002。

昌等總庫，另有包括 3 個獨立庫，4 個分庫等總計 29 個，其庫儲與補給路線，皆可見與 1936 年動員計畫的延續性。¹⁵⁰

另外，指揮官與幕僚的能力須於經驗中成長，參謀本部依據全國國防作戰計畫的需要，舉辦參謀旅行或軍事演習，以求增進指揮官與幕僚之學識經驗。如 1934 年秋季參謀本部所屬陸軍大學校的參謀旅行，係於中日兩軍極可能發生衝突的華北要地舉行，考察北口、康莊、居庸關、昌平、高麗營、順義、通縣、香河、北平等地。¹⁵¹

又如，1935 年參謀本部於首都南京東南方的溧陽附近舉行秋季演習，為中日衝突另一個熱點長江下游做準備，參謀本部高層幾乎全員出動，蔣中正親任統監，兩位參謀次長楊杰、熊斌任統監部副參謀長，軍委會辦公廳副主任劉光(剛卸任參謀本部第一廳廳長)任統監部參謀處主任，現任參謀本部第一廳廳長張亮清任統監部參謀處副主任。駐紮長江下游各部為演習主體，張治中(1890-1969)任演習東軍司令官，谷正倫任西軍司令官，第八十七師王敬久(1902-1964)部、教導總隊桂永清(1901-1954)部、第三十六師宋希濂(1907-1993)部等皆投入演習。¹⁵²演習統監部高層，為 1937 年開戰初期的軍事決策高層(詳後)，至於演習投入之武裝力量，即為淞滬會戰初期投入的部隊。¹⁵³

150 「盧溝橋事變後統帥部歷次會議紀錄」(1937 年 7 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頁 235-236、284。

151 參閱張亮清編，《民國二十三年陸軍大學校參謀旅行記事》(南京：軍用圖書社，1935)。

152 參閱參謀本部編，《民國二十四年度秋季大演習記事》，第 1、2 卷(出版地不詳：編者不詳，1935)。

153 此一首都附近的秋季演習，蔣中正令每年舉辦，成為定例，1936 年底曾有舉辦，1937 年已有演習大綱，惟因全面戰爭爆發，並未實施。「蔣中正致朱培德手令」(1936 年 11 月 25 日)，〈革命文獻——國防設施(一)〉，《蔣

再如，1937年春季，參謀本部舉辦參謀旅行，由南京出發，先赴徐州行現地戰術兩日，繼赴海州行海岸偵查兩日，然後實施演習，參謀總長程潛親自出任總裁。事後參謀本部第一廳經不斷研討，認為該區國防建設有應行調整之處，遂擬訂「二十六年度春季參謀旅行關於徐海方面國防建設之所見」。¹⁵⁴開戰後日本大軍並未登陸海州，而是大舉進攻上海，海州防禦因此並未進入日後中日戰史論著的視野，然而此地之戰略地位，確為當時中日兩軍所重視，乃有參謀本部不斷的計畫修訂。¹⁵⁵

(三) 開戰後國軍的行動

盧溝橋事變爆發後蔣中正與中日兩軍的作為，學界已有很多論述。本節不多贅述，而是將戰前計畫與開戰初期國軍的行動做一對比，以示開戰後究竟有無實踐戰前計畫。

蔣中正獲悉事變之後，即於次日調派部隊北上增援，是日自記：「決心應戰，此其時乎？」¹⁵⁶接著於7月9日，要求人在山東、負責

檔》，典藏號：002-020200-00023-021；「民國二十六年度秋季大演習計畫綱要」〈國防設施計畫(三)〉，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05-004。

¹⁵⁴ 「程潛致蔣中正電」(1937年6月14日)，〈一般資料——呈表彙集(五十六)〉，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483-095；〈1937年春參謀本部作戰演習方略及經過(附關於徐海方面國防建設意見)〉，《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62。

¹⁵⁵ 日軍1935年的作戰計畫，規劃山東方面的作戰，將以陸軍1個軍(2個師團)的兵力，與海軍協同，在山東半島以及海州附近登陸，占領青島、濟南、海州附近之重要區域。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頁101。

¹⁵⁶ 《蔣中正日記》，1937年7月8、9日。

華北軍事的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駐保定指揮；統帥部也決定「各部速就國防位置」。¹⁵⁷7月26日，中日雙方於北平發生衝突，蔣迅速調兵遣將，於官邸會報上決定「我軍應按照原定計畫，在滄保、滄石二線上集中，構成陣地，期在此線上與敵作整齊之戰鬥」，並電告宋哲元說中央軍將援助平津，期與敵在永定河地區作戰，先以主力集中滄州、保定之線。¹⁵⁸已而平津失陷，蔣中正仍持續調兵北上集中於滄保線、德石線，下令抵達華北的部隊趕築防禦工事，並細瑣指示陣地戰應注重重點。同時，蔣也重視積存糧秣，要求河北各縣長負責屯積糧米，須存足3個月，復電示平漢與津浦兩路，至少運足前方所需糧秣4個月以上。¹⁵⁹

8月7日，國防聯席會議召開，何應欽與劉光進行軍事報告，提到彈藥準備依作戰需求分配，「黃河以北為三分之二，江南為三分之一」。全國第一期動員者100個師，預備軍約80個師，分配於冀魯等地60個師，於晉綏察15-20個師，上海、杭州、乍浦10個師，福建、廣東等地15個師。其中，往河北者共約50個師，正源源向滄州、保定、石家莊一帶集中。¹⁶⁰

依據以上鋪陳，開戰初期國軍的行動，可說與戰前最後的國防作

157 「盧溝橋事變後統帥部歷次會議紀錄」(1937年7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236。

158 「在委座官邸會報決定事項」(1937年7月27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285。

159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5冊(臺北：國史館，2014)，頁335-375。

160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頁30；「國防聯席會議記錄」、「何應欽關於中央軍事準備報告稿」(1937年8月7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290-292、336。王世杰誤將師數作人數。

戰計畫「甲案」相近。至於動員狀況，與 1936 年動員計畫若合符節，除了皆重視華北戰場，開戰第一線作戰軍數量相同，而預備軍則有所增加，糧秣積存與戰前規劃 3 個月亦相距不遠。

依照「甲案」，華北將編成第一、第二兩個集團軍，此時依計畫編成，由豫皖綏靖公署主任劉峙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負責平漢線之作戰；¹⁶¹原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任第一集團總司令，負責津浦線北段之作戰。¹⁶²兩個集團軍的組成與任務，與「甲案」相近。

至於開戰後的對日戰術，也與「甲案」相近。「甲案」提到游擊戰術的運用，開戰後，蔣中正將游擊戰術付諸實施，電宋哲元等華北軍事領導人，設法在華北組織小部隊到處擾亂、夜襲、拆軌、放空槍等，使敵占區不能安定，以便國軍集中後之反攻；蔣並希望利用傳統的保甲制度，由軍隊組織動員民力，認為這種騷擾日軍的戰術若能迅速進行，將為「制敵死命惟一之要道」。¹⁶³

攻勢防禦是歷年作戰計畫不斷提及並極其重視的戰術，「甲案」明示國軍集中華北陣線後，並非僅消極障地防禦，以拖待變，而是主動發動攻勢，與日軍決戰或會戰。法肯豪森自戰前便力主在華北主動出擊，前述〈應付時局對策〉與〈北正面防務之研究〉已可見其意見。平津失陷之後、8 月初，法肯豪森以為如早些採取攻勢，必可將平津日軍殲滅，「但目下再準備攻勢，尚未為晚，因集部隊已不少也」。¹⁶⁴

¹⁶¹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 9。

¹⁶²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頁 1。

¹⁶³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 5 冊，頁 357、360、387。

¹⁶⁴ 「盧溝橋事件第三十次會報」（1937 年 8 月 9 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 280。

反攻平津而外，時日軍向平津之側翼平綏線進攻，國軍所在必守，這在戰前國防計畫早已計及，將編成第七集團軍進行防衛。¹⁶⁵開戰後，蔣中正照戰前計畫編成該軍，令綏遠省政府主席傅作義(1895-1974)為第七集團軍總司令，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汝明(1895-1975)為副總司令，第十三軍軍長湯恩伯(1899-1954)為前敵總指揮，¹⁶⁶主持該地防務。

至於沿江海方面，也依戰前計畫實施防禦部署。長江擬撤除燈塔、航標，準備封鎖。¹⁶⁷長江中游之漢口早為國軍計畫重點之一，蔣中正電何應欽速定進攻漢口日租界之計畫、指定各部隊任務與準備應須之經費。¹⁶⁸上海方面，張治中作為戰前國防計畫京滬區的負責長官，秘密進行準備工作。¹⁶⁹1937年8月13日，中日兩軍於前線擦槍走火。14日，國軍依計畫主動出擊，後來演為大規模會戰。¹⁷⁰

山東沿岸方面，戰前計畫便考慮日軍可能於此登陸，故蔣中正正在七七過後沒過幾天的7月11日，電令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星夜趕築魯東國防工事。15日，又電韓復榘、青島市長沈鴻烈(1882-1969)，以日本第五、十兩師團已整裝待發，其目的地必在青島、濟南，務望從速準備。同日電何應欽，立即規定集中濟南、青島方面之增援部隊。¹⁷¹24日，再電韓復榘、沈鴻烈，告以「十日內倭寇必向我山東進迫」，務望星夜

165 〈1937年作戰計畫(甲)〉，《戰史會檔》，檔號：七八七-2132。

166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頁48。

167 「盧溝橋事變後統帥部歷次會議紀錄」(1937年7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241。

168 「蔣中正致何應欽電」(1937年7月30日)，〈籌筆——抗戰時期(一)〉，《蔣檔》，典藏號：002-010300-00001-056。

169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華文出版社，2014)，頁80-83。

170 Peter Harmsen,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Havertown: Casemate, 2013), 48-53.

171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5冊，頁339-342。

趕築工事，完成防務，密告所部時時警戒。¹⁷²

山東沿岸南側的徐海，駐紮國軍中央軍精銳部隊第一軍胡宗南部、第二師黃杰部。¹⁷³8月2日，蔣中正電黃提醒日本將在海州附近登陸，應特別警戒，夜間尤應防敵襲擊。3日，電胡、黃趕築徐海及蚌埠工事，同日又連電韓復榘、沈鴻烈、胡宗南(1896-1962)、黃杰(1902-1995)等指示防禦部署，提醒他們日本兩支艦隊已在海州附近，不久必在海州各口岸登陸，各部隊主力應集中海州增防。¹⁷⁴此際，蔣一度以為「全部戰略之弱點乃在山東」，¹⁷⁵重視山東沿海、海州防禦及隴海線的部署，要求在地軍事長官積極準備。¹⁷⁶

要之，作為最高決策者，蔣中正在中日戰爭初期有很多政略考量，不過在大軍調度上，並非臨機部署，大抵依「甲案」而行，其軍事決策有參謀本部戰前長期計畫的背景。

172 「蔣中正致韓復榘沈鴻烈電」(1937年7月24日)，〈籌筆——抗戰時期(一)〉，《蔣檔》，典藏號：002-010300-00001-030。

173 津浦警備事宜歸陸軍第一軍軍長胡宗南管理，警備司令部設徐州；隴海警備事宜，歸稅警總團司令兼第二師師長黃杰(後升任第八軍軍長)管理，司令部設海州。爾後淞滬會戰擴大，兩部才調到上海應戰。胡健國主編，〈黃杰先生事略〉，《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20輯(臺北：國史館，2000)，頁368-369。

174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5冊，頁364-365。

175 《蔣中正日記》，1937年8月8日。

176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5冊，頁394。蔣中正的判斷與情報並非沒有根據，1937年7月底，日軍計劃以1個師團登陸青島，保護日本僑民，第十四師團於8月底從大阪出發，先向大連前進，後來隨著戰況發展，改往天津，最後放棄登陸青島。井本熊男，《作戰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変》(東京：芙蓉書房，1978)，頁109、112。

(四) 開戰初期的全國國防作戰計畫

先是，軍政要員自廬溝橋事變以來，召開數次會報規劃全國作戰部署，商討軍隊北調及各地防禦細節。這幾次會報，係由軍政部部長何應欽召集，參與者以軍政部主管為主，軍委會辦公廳、參謀本部要員在列，參謀本部科長羅澤闓(1905-1987)於歷次會議報告情報。曾任參謀本部第一廳廳長的劉光負責擬案全國戰鬥序列，此一戰鬥序列與先前蔣中正批准之作戰計畫相一致，爾後續由參謀本部第一廳廳長龔浩擬就各部編制。¹⁷⁷至於應付非常時期各項方案，由參謀本部第一廳及軍委會部分成員負責規劃。總動員計畫也重新擬議，由後勤總管俞飛鵬(1884-1966)為主任，軍政部、軍委會辦公廳、參謀本部、行政院、資源委員會等成員共同負責。¹⁷⁸

戰爭爆發之初，國軍部署大抵依戰前計畫。8月20日，大本營正式頒布開戰後之全面戰爭計畫，計有4份。「戰爭指導方案」將全國區分為第一至第五戰區，五個戰區有三個在華北(一、二、五)，蔣中正親兼一、五兩個戰區的司令長官；「國軍作戰指導計畫」規劃主戰場之正面在第一戰區，主戰場之側背在第二戰區，而第三戰區對於入侵淞滬之敵，應迅速掃蕩，確保京滬政治經濟重心；「第一戰區北正面作戰計畫」，規定第一戰區主要任務，在拒止敵人沿津浦、平漢兩鐵路南下，同時側擊敵人對南口之攻擊，保持機動性，準備隨時向北平、南口方面取攻勢、收復失地；「第三戰區作戰指導計畫」，指導方針

177 「廬溝橋事變後統帥部歷次會議紀錄」(1937年7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238、240-241、251、268。

178 「抗戰須持久談話會紀錄」(1937年7月20日)，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298-299。

在掃蕩上海敵軍根據地，粉碎日軍沿江沿海登陸之敵，以鞏固首都及經濟策源地。¹⁷⁹這些計畫內容，重視華北戰場、攻勢防禦、上海主動出擊，可說為「甲案」的延伸。

首當其衝的第一戰區、第三戰區與第五戰區，參謀本部皆派人協助，落實其戰前長期規劃。如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初為蔣中正親任，爾後即由參謀總長程潛出任，程即派前參謀本部第一廳廳長龔浩為參謀長。¹⁸⁰又如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初為馮玉祥，馮請西北軍舊識參謀次長熊斌出任其參謀長，蔣中正以熊另有任務，可先代理，熊遂找尹呈輔任戰區參謀處長，協助組成戰區長官部，蓋尹為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一處處長，主管作戰業務，敵我情況均甚熟悉，可收駕輕就熟之效，熊並請蔣准將參謀本部第一廳第一處人員全部調去，蔣允其所請。¹⁸¹再如歷經改組的第五戰區，以李宗仁(1891-1969)擔任司令長官，李欲於軍委會找一幹員為參謀長，以促進與中央的聯絡，遂邀請籌劃作戰頗為知名的參謀本部第二廳廳長徐祖詒(1895-1976)出任，由其組織司令長官部。¹⁸²徐在第五戰區長官部貢獻很大，臺兒莊之役時的臨沂戰場由其

179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頁34-51。

180 〈湖南文獻第十卷第三期——龔浩先生行述及記龔孟希老將軍等文〉，國史館藏，《褒揚史料》，入藏登錄號：1550710030003A。

181 其實，在七七事變爆發未久，蔣中正便派熊斌到華北視察並勉宋氏，因為熊係參謀本部要員，深悉國軍作戰計畫，1933年初曾派赴北平協助何應欽軍事，又與戍守平津的西北軍宋哲元素有淵源。胡春惠、林泉訪問，林泉紀錄，《尹呈輔先生訪問紀錄》，頁41-42；熊斌，〈熊斌「六十回憶」〉，《傳記文學》，64：1(臺北，1994.1)，頁22；沈雲龍、謝文孫訪問，謝文孫紀錄，〈征戰西北〉，頁72、76

182 于翔麟，〈徐祖詒(1895-1976)〉，《傳記文學》，45：2(臺北，1984.8)，頁138；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頁687-688。

指揮，獲得佳績。與李宗仁同為桂系要角的白崇禧(1893-1966)，對其讚譽有加，稱「參謀長徐祖詒運籌帷幄熟爛兵略，為一不可多得之幕僚長」；「徐之為人精幹沉著，我曾見其擬定之作戰計畫，其戰術修養優越，指揮軍隊迅速，為一不可多得之幕僚長」。¹⁸³徐所以可以在第五戰區有所發揮，或為其參謀本部的歷練與戰前曾赴前線考察之故，¹⁸⁴此亦可見戰前參謀本部作用之延續。

六、結語

綜合全文所論，可以得到以下幾點結論：

第一、國府北伐底定後，全國軍事機關改組，其中，參謀本部是擬訂國防計畫最重要的機關，蔣中正自 1932 年以來，親自擔任參謀總長至 1935 年，主導改組參謀本部，並推動研擬諸多國防作戰、建設計畫。蔣中正身為軍委會委員長為人所知，其擔任參謀總長卻鮮少為人注意；參謀本部的作用，一般亦不十分清楚。本文藉國防計畫的研擬，呈現參謀本部所扮演的角色、德國軍事顧問的作用；雖國軍基層參謀制度運作不善，但高層的參謀本部可說漸上軌道。

第二、論者多強調 1932 年一二八事變之後，國府才進行全國國防計畫的規劃，其實自 1928 年 5 月國民革命軍於濟南與日軍衝突以

¹⁸³ 賈廷詩、陳三井、馬天綱、陳存恭訪問紀錄，郭廷以校閱，《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頁 168、173、178。

¹⁸⁴ 徐祖詒係日本陸軍大學畢業，歷任參謀本部第一、二廳處長、副廳長、廳長，在職期間撰有《日本國防計畫》一書，頗受軍界重視。1937 年春與參謀本部成員赴徐海實行參謀旅行。「賀耀組致蔣中正電」(1933 年 8 月 4 日)，〈一般資料——民國二十二年(四十二)〉，特交檔案，《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112-022；〈徐祖詒〉，《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入藏登錄號：129000013003A。

來，國府假想敵已自英國漸轉為日本。1929年4月，參謀本部擬訂「中華民國國防計畫綱領草案」，以日本為假想敵，規定國防永久計畫之大綱，以為國防各種事業規劃之標準。一二八事變之後，該計畫被重新翻出，參謀本部據以參考研擬新的計畫。又或謂國府自1935年，始較為認真進行國防計畫之規劃，實則在此之前，參謀本部已擬訂數份計畫，只是在1934年底以後，剿共軍事獲大幅進展，國軍投入更多資源於對日國防。

第三、日軍歷來對華作戰計畫，皆規劃速戰速決，以便騰出手面對蘇聯這個真正的強敵。在中國華北方面，日軍擬進攻平津，陸軍並與海軍協同，登陸山東半島、海州，占領青島、濟南、海州等要地；華中方面，於長江下游登陸，占領上海附近，並於杭州灣登陸；華南方面，占領福州、廈門、汕頭等地。¹⁸⁵國府參謀本部的計畫，判斷日軍將以主力從河北南下，同時侵襲江海各要點，如進攻沿海的青島(膠州灣)、海州(連雲港)，威脅國軍華北作戰軍之側背；上海方面，日軍將以有力部隊登陸進攻，並可能於杭州灣乍浦附近登陸；杭州灣以南，日軍將有局部攻擊，可能占領福州、廈門、汕頭等地。日軍與國軍之計畫兩相對照，國軍參謀本部的敵情判斷，可說相當正確。

第四、國軍重視長江流域及沿海等國府中樞地帶，特別擬訂「中部國軍作戰計畫」等相關沿江海之計畫。由於中央對華北掌控有限，且中央軍隨著共軍進入西南，獲四川廣大根據地，國軍高級將領曾有開戰後放棄華北、於上海開戰、引敵南下至長江流域或轉變日軍作戰線之討論。這個意見為在參謀本部擁有相當影響力的德國總顧問法肯豪森所駁斥，其亦重視長江流域及四川根據地，但極力反對開戰後放

¹⁸⁵ 日本參謀本部曾計劃從華北沿平漢路南下，策應沿長江向漢口的作戰，後來因對蘇防備的兵力不足，戰前已將此規劃刪去。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變陸軍作戰(1)》，頁100-104。

棄華北或沿海，他以很長的報告分析利弊。後來國軍的計畫，仍以華北為主戰場，並更為強調於此強硬抵抗，與敵決戰、會戰或陣地戰；至於江海要地如上海之日軍，將主動肅清，先發制敵。質言之，至少就本文考察範圍的國軍國防作戰計畫(1929年至1937年8月)，其圖像是開戰之初於華北與沿江海主動出擊，採攻勢防禦，戰事不利後轉為持久消耗戰，節節向西轉進，並沒有引敵南下的戰略意圖，也未謀劃主動移轉日軍的作戰線。

第五、政府部門的紙上作業，與實際執行不見得一致，這種狀況早為人所指出。或謂參謀本部諸多計畫，可能只是表面規劃，紙上談兵，根本未能執行，說是一套、做是一套。由於當時的計畫甚多，當中有應付之作，的確不無可能，惟大軍作戰兵力龐大、期程較長、後勤複雜，具鈍重性，為計畫性的作戰，切忌臨機性的大幅變動。無論國家武力的整體運用，或策劃戰役、發動會戰，均需擬訂概念清晰的全程構想，具體實踐的戰略指導及兵力運用的作戰計畫。¹⁸⁶是時參謀本部確曾溝通各部門，派員至各要地考察、撰寫報告、分析利弊，德國顧問參與其中，蔣中正並親筆圈點批示各種計畫。開戰後，蔣中正諸多部署，與戰前計畫若合符節，可見其指揮非僅隨現勢臨機應變，應有參謀本部長久戰略規劃的支撐。參謀本部人員，開戰後亦紛赴前線協助指揮。因此，參謀本部的諸多計畫，係實際規劃面對戰爭之用，非僅官僚機構的紙面作業。

第六，開戰初期以後之戰況發展，「恰為一個不可透視之幕所

¹⁸⁶ 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史館館刊》，50(臺北，2016.12)，頁102。本文作者曾任國防部陸軍司令部作戰署長。

掩」，¹⁸⁷計畫必定隨情勢而改變，並且由於戰爭是政治的延伸，國軍戰略也將與政略連動而有不同的發展。爾後的淞滬會戰，演為抗戰八年最大規模的會戰，並未為戰前計畫所計及，事後諸多記述，很正常集中於此，遂多少掩蓋國軍對於上海之外的作戰規劃。其實，參謀本部對於華北、山東、海州等地皆有長期規劃防禦部署，開戰後蔣中正也很重視這些區域。另外，一般認為中日兩軍戰力對比巨大，國軍宜採持久戰，然而究竟如何持久，在開戰初期的規劃不僅為後來認識的在廣大空間運動戰、游擊戰，而是重視主動出擊與大規模的陣地戰，此點於認識中日戰爭開端可以特別注意。至於何以國軍會採取如此戰法？此戰法之成敗得失為何？此牽涉國際軍事學術之發展、國軍內部之情況與戰局之演變，擬另文分析探討。

(本文於 2019 年 9 月 2 日收稿；2020 年 2 月 17 日通過刊登)

* 本文為 2016 年度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蔣中正於華北的對日軍事布局(1932-1937)」(計畫編號: MOST 105-2410-H-292-005) 延伸成果，獲兩位匿名審查人諸多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¹⁸⁷ 布爾林講，陳非譯，《戰略原理》(出版地不詳：陸軍大學，出版時間不詳)，頁 256。布爾林為白俄籍國軍陸軍大學教官，主講戰略，曾任職參謀本部總顧問室。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一) 檔案史料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國防部史政局及戰史編纂委員會》，七八七-1957、1959、1960、1968、1969、1971、1972、1973、1975、1979、1980、1981、1986、1989、1993、1995、1996、1998、2006、2007、2008、2013、2016、2025、2059、2110、2121、2124、2126、2130、2131、2132、2133、2146、2147、2159、2162、2362、2556、2575。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藏，《軍委會參謀本部》，七六七-97。

美國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藏，《蔣中正日記》，2006C37。

國史館藏，《國民政府》，001-012071-00119-003、001-012071-00119-023、001-012071-00119-027、001-012071-00119-028、001-012071-00119-029、001-032102-00031-031、001-032107-00029-024。

國史館藏，《蔣中正總統文物》，002-010200-00104-015、002-010300-00001-030、002-010300-00001-056、002-020200-00016-152、002-020200-00023-001、002-020200-00023-021、002-020200-00023-037、002-080102-00004-002、002-080102-00005-004、002-080102-00054-001、002-080102-00054-002、002-080102-00055-001、002-080102-00055-003、002-080102-00056-002、002-080114-00007-001、002-080200-00112-022、002-080200-00207-025、002-080200-00462-022、002-080200-00483-095、002-090200-00006-218。

國史館藏，《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129000013003A、129000035818A、129000084113A、129000093304A、129000098543A、129000098603A、129000098793A。

國史館藏，《個人史料》，1280051580001A。

國史館藏，《褒揚史料》，1550710030003A。

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藏，《國防部史政編譯局》，B5018230601/0029/570.3/6015。

(二) 史料彙編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5輯第1編，軍事1、軍事5，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4。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抗日戰爭正面戰場》，上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5。
- 王正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7冊，臺北：國史館，2005。
- 何應欽編，《何上將抗戰期間軍事報告》，上冊，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8。
- 呂芳上主編，《蔣中正先生年譜長編》，第5冊，臺北：國史館，2014。
- 周美華編註，《蔣中正總統檔案——事略稿本》，第13冊，臺北：國史館，2004。
- 胡健國主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20輯，臺北：國史館，2000。
- 秦孝儀主編，《中國國民黨歷屆歷次中全會重要決議案彙編(一)》，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9。
- 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演講，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84。
- 秦孝儀總編纂，《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第2卷，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黨史委員會，1978。
- 馬振犢編選，〈國民黨政府1937年度國防作戰計畫(甲案)〉，《民國檔案》，1987：4(南京，1987.11)，頁40-52。
- 馬振犢編選，〈國民黨政府1937年度國防作戰計畫(乙案)〉，《民國檔案》，1988：1(南京，1988.2)，頁36-43。
- 郭恆鈺、羅梅君主編，許琳菲、孫善豪翻譯，《德國外交檔案》，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三) 日記、回憶資料

- 王世杰著，林美莉編輯校訂，《王世杰日記》，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2。
- 朱維亮，〈憶父親朱培德〉，《湖南文史》，2003：8(長沙，2003.8)，頁24-27。
- 何智霖編輯，《陳誠先生回憶錄——抗日戰爭》，上冊，臺北：國史館，2004。
- 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下冊，臺北：李敖出版社，1988。
- 沈定，〈軍委會參謀團與滇緬戰役〉，收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遠征印緬抗戰》編審組編，《遠征印緬抗戰》，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
- 沈雲龍、謝文孫訪問，謝文孫紀錄，〈征戰西北——陝西省主席熊斌將軍訪問紀錄〉，《口述歷史》，2(臺北，1991.2)，頁45-100。
- 胡春惠、林泉訪問，林泉紀錄，《尹呈輔先生訪問紀錄》，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92。
- 胡寶華，〈北洋政府參謀本部瑣憶〉，《文史精華》，2001：11(石家莊，2001.11)，頁53-56。

- 徐永昌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徐永昌日記》，第3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
- 張治中，《張治中回憶錄》，北京：華文出版社，2014。
- 萬耀煌，《萬耀煌將軍日記》，上冊，臺北：湖北文獻社，1978。
- 賈廷詩、陳三井、馬天綱、陳存恭訪問紀錄，郭廷以校閱，《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
- 熊斌，〈熊斌「六十回憶」〉，《傳記文學》，64：1(臺北，1994.1)，頁15-24。

二、近人論著

(一) 專著

- 井本熊男，《作戰日誌で綴る支那事变》，東京：芙蓉書房，1978。
- 外務省情報部編纂，《現代中華民國滿洲帝國人名鑑(1937)》，東京：財團法人東亞同文會，1937。
- 布爾林講，陳非譯，《戰略原理》，出版地不詳：陸軍大學，出版時間不詳。
- 何應欽，《日軍侵華八年抗戰史》，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5。
- 李雲漢，《中國國民黨史述》，第3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94。
-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大本營陸軍部(1)——昭和十五年五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67。
- 防衛庁防衛研修所戰史室，《支那事变陸軍作戰(1)——昭和十三年一月まで》，東京：朝雲新聞社，1975。
- 南京圖書館編，《中國近現代人物像傳》，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孫文，《三民主義》，臺北：臺灣省訓練團，1946。
-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增訂本)》，上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
- 袁績熙編譯，《參謀業務》，南京：軍用圖書社，1933。
- 馬永祥、尤文遠主編，《保定軍校千名將領錄》，北京：方志出版社，2001。
- 馬振犢，《慘勝——抗戰正面戰場大寫意》，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
- 馬振犢、戚如高，《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的中德關係》，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98。

- 參謀本部編，《民國二十四年度秋季大演習記事》，第1、2卷，出版地不詳：編者不詳，1935。
- 國防部史政局編，《德國駐華軍事顧問團工作紀要》，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9。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抗日戰史——武漢會戰(一)》，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1。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平漢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 國防部史政編譯局編，《抗日戰史——津浦鐵路北段沿線之作戰》，臺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1982。
- 張亮清編，《民國二十三年陸軍大學校參謀旅行記事》，南京：軍用圖書社，1935。
- 郭岱君主編，《重探抗戰史(一)——從抗日大戰略的形成到武漢會戰(1931-1938)》，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5。
- 陳啟天，《孫子兵法校釋》，上海：中華書局，1947。
- 陶菊隱，《蔣百里先生傳》，上海：中華書局，1948。
- 滿鐵調查部，《連雲港經營現狀ノ概要ト對策案》，出版地不詳：出版者不詳，1941。
- 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九千將領》，蘭州：中華工商聯合出版社，1993。
- 劉國銘主編，《中國國民黨百年人物全書》，北京：團結出版社，2005。
- 劉壽林、萬仁元、王玉文、孔慶泰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
- 劉維開，《國難期間應變圖存問題之研究——從九一八到七七》，臺北：國史館，1995。
- 樋口正德編，《最新支那要人傳》，大阪：朝日新聞社，1941。
- 蔣緯國總編著，《國民革命戰史第三部——抗日禦侮》，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1978。
- 薛毅，《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
- 蘇聖雄，《戰爭中的軍事委員會——蔣中正的參謀組織與中日徐州會戰》，臺北：元華文創，2018。
- Harmsen, Peter. *Shanghai 1937: Stalingrad on the Yangtze*. Havertown: Casemate, 2013.
- Worthing, Peter M. *General He Yingqin: 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alist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Zabecki, David T. *Chief of Staff: The Principal Officers behind History's Great Commanders*, vol. 1. Napoleonic Wars to World War I. Annapolis: Naval Institute Press, 2008.

(二) 論文及專文

- 于翔麟，〈徐祖詒(1895-1976)〉，《傳記文學》，45：2(臺北，1984.8)，頁138-139。

- 余子道，〈論抗戰初期正面戰場作戰重心之轉移——與臺灣學者討論發動淞滬會戰的戰略意圖問題〉，《抗日戰爭研究》，1992：3(北京，1992.8)，頁 1-21。
- 袁成毅，〈全面抗戰爆發前國民政府對日本侵華軍事戰略之研判〉，《抗日戰爭研究》，2018：2(北京，2018.5)，頁 97-106。
- 馬振犢，〈1936-1937 年國民黨政府國防作戰計畫剖析〉，收入《民國檔案與民國史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北京：檔案出版社，1988，頁 411-422。
- 馬振犢，〈平心靜論「八一三」〉，《抗日戰爭研究》，2001：1(北京，2001.2)，頁 101-114。
- 張建軍，〈民國北京政府參謀本部的內外人事與戰時指揮〉，《廣播電視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呼和浩特，2010.5)，頁 83-87。
- 張鑄勳，〈析論蔣中正在中國抗日戰爭初期的戰略指導〉，《國史館館刊》，50(臺北，2016.12)，頁 97-146。
- 戚厚杰選輯，〈1933 年國防作戰計畫〉，《民國檔案》，2006：4(南京，2006.11)，頁 18-26。
- 梁紫蘇，〈簡述漢口日租界〉，《武漢文史資料》，2006：7(武漢，2006.7)，頁 53-55。
- 陳長河，〈國民黨政府參謀本部組織沿革概述〉，《歷史檔案》，1988：1(北京，1988.2)，頁 110-111。
- 陳謙平，〈試論抗戰前國民黨政府的國防建設〉，《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社會科學)》，1987：1(南京，1987.1)，頁 23-31。
- 劉維開，〈國民政府的備戰〉，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第 1 編：和戰抉擇，臺北：國史館，2015，頁 217-303。
- 盧勇，〈早期抗戰的重要機構——國防設計委員會述略〉，《抗日戰爭研究》，2009：3(北京，2009.8)，頁 93-103。
- 薛光前，〈蔣百里的軍事思想〉，收入蔣復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第 6 輯，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頁 133-195。
- 蘇聖雄，〈陳誠的抗戰戰略新探〉，《中華軍史學會會刊》，23(臺北，2018.12)，頁 123-138。
- 蘇聖雄，〈蔣中正對淞滬會戰之戰略再探〉，《國史館館刊》，46(臺北，2015.12)，頁 61-101。
- 龔浩，〈蔣方震百里先生之生平風格〉，收入蔣復璁、薛光前主編，《蔣百里全集》，第 6 輯，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頁 261-266。
- Chang, Jui-te. "The Nationalist Army on the Eve of the War." In *The Battle for China: Essays on the Military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937-1945*. Edited by Mark Peattie, Edward Drea, and Hans van de Van, 83-10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The National Defense Plans of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s and Their Early Execution (1929-1937)

Sheng-hsiung Su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How di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 prepare itself in the face of the full-scale outbreak of the Sino-Japanese War? What were Chiang Kai-shek's military plans? These issues have long occupied scholars. This article seeks a new path that leads to new discoveries by closely examining the endeavors of the military's staff organization at the highest levels. Among the Great Powers, from the nineteenth century onwards, the highest levels of military staff gradually became the core of their top level military organizations. The general staff provided information, drafted detailed military plans, transferred military orders, and oversaw how the commander executed war plans. The same organization could also be found in late Qing China when the empire undertook military reforms in imitation of the Western and Japanese systems. In Republican China, this organization came to be named "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s." In early Republican years, military institutions were still embryonic; therefore, the General Staff did not exert significant functions until it was reorganized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While Chiang Kai-shek was often known by his post as Chairman of the Military Affairs Commission, few remember that Chiang concurrently held the post of Chief of Staff for a long

time in order to supervise the planning and drafting of national defense strategies against the Japanese forc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national defense plans made by the 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s. It tries to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o made the plans? How? What were they? What were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se plans? How did plans develop over time? Was there any intention to draw the enemy southward or divert the Japanese army's operational line? Lastly,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execution of the plans when the Sino-Japanese War broke out. It finds that in contrast to low level staff units, who tended to be ignored, the 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s was able to inspect key strongholds nationwide under the suggestions of German military advisors and drew up plans on all levels. These plans did not merely exist on paper. They were able to foresee the deployments of Japanese armies and were effectively executed in the early stages of the war. The Battle of Shanghai was pre-planned without strategic intention to draw the enemy southwards. To strengthen Southwestern strongholds in preparation of the National Revolutionary Army's retreat was also stated in plans, while the areas in northern China, along river banks, and on seacoasts were not intended to be abandoned easily. Apart from drawing up well-known plans such as mobile warfare and guerilla warfare over large spaces, the General Staff also laid emphasis on strategic techniques such as active defense, decisive battle, counter-offensive, and large-scale trench warfare.

Keywords: Chiang Kai-shek, General Staff Headquarters, National Defense Plan,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trench warfare